

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通讯

Newsletter of Fudan-Harvard Medical Anthropology Collaborative Research Center

# 人類學之友

## 本期推荐

朱剑峰：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谈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问题奶粉事件辨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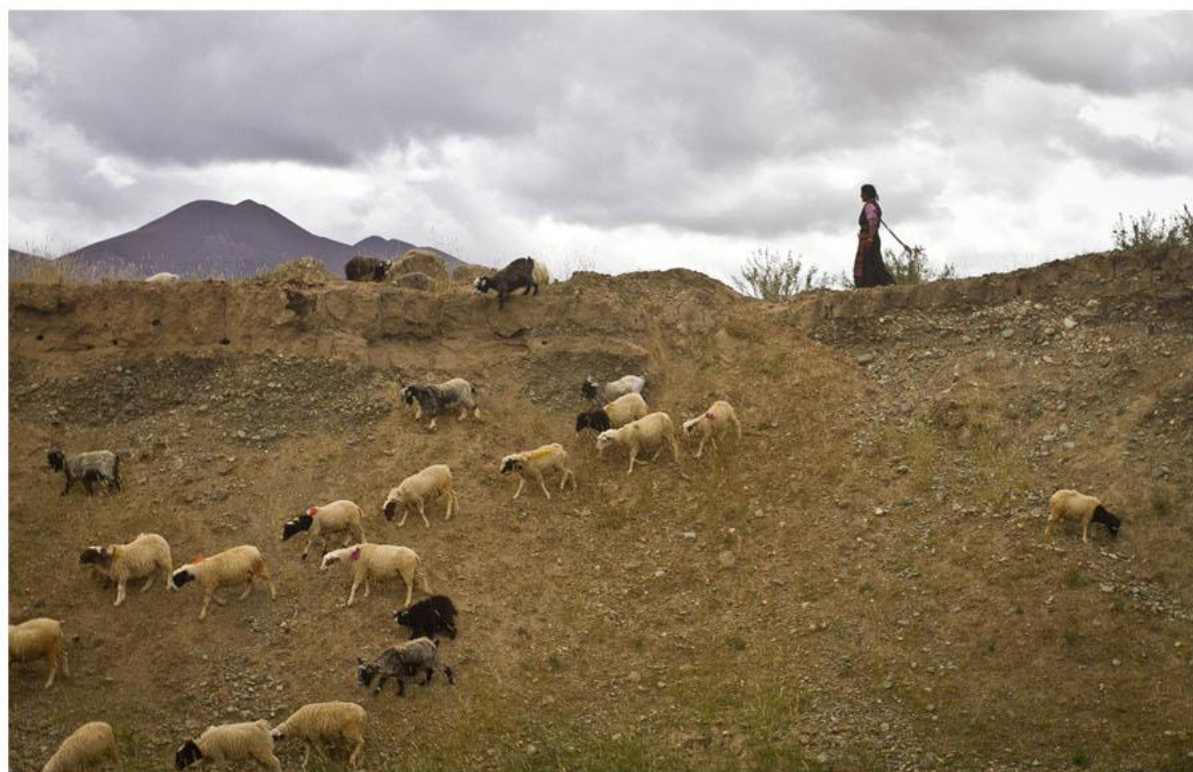
董丽霞：村庄里的大棚  
——寿光模式的人类学思考

復旦大學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NO.2 2013

总第三期



牧羊女放牧，2001年9月西藏自治区日喀则 摄影：洪浩瀚

# 人類學之友

特邀顾问：梁鸿 刘欣 纳日碧力戈

海外顾问：凯博文(Arthur Kleinman)

罗力波(Fuji Lozada)

邵镜红(Jeanne Shea)

陈宏图

顾问（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

陈侃 陈家华 程远

范丽珠 顾东辉 桂勇

马志军 彭希哲 瞿铁鹏

任文伟 孙嘉明 沈奕斐

于海 俞志元 张乐天

赵德余 朱剑峰 周怡

主编：潘天舒

责编：董丽霞 冯然

设计：邹骏飞 沈艳

版面：陈相超 李铨涵

校对：张小星 申言夫

2013 年第 2 期  
(总第三期)

## 卷首语

生物和考古人类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伴随着人类进化发展和文明的产生是一个植被消失、土壤退化和物种灭绝的过程。生活在数码化时代的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依赖和需求，与史前人类和游牧民族等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从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开始，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拯救生态失衡的地球成为一个全球性议题。“可持续发展”迅速成为流行词，被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赋予强烈的权威性和学术性，成为生态环保国际会议和发展论坛必不可少的修饰品。“可持续发展”原本是来自学界的一种旨在控制经济高速增长的折衷之策。它描述的是在理想状态下，以回收物质资源和最大程度控制污染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国际发展领域，“可持续发展”很快为专家和顾问理解和接受，成为与增长导向模式、均衡分配模式和人文发展模式分庭抗礼的新型模式。

作为理念，“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为后代能永续发展而对今世今人的行为做出规范和约束的远见卓识。而作为说辞，它在环保主义者、学者、政府官员和商人中间口口相传，使用频率之高到了词不达意的程度。借助田野案例，本期《人类学之友》试图寻求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语境中，如何通过植根于基层的体验和感悟，来洞察横亘在高谈阔论和冷峻现实之间无法填平的沟壑，探讨它作为一套足以引领公众意向的话语，在全球化和后现代的语境中被权力精英肆意操控乃至消解的可能性。

由于学科视角和专长所带来的优势，人类学者清醒地体认到：以高科技名义包装的农业“绿色革命”实践和婴幼儿配方奶消费市场论坛，一旦沦为逐利平台，发动和主持话语讨论的多为各类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与此同时，包括普通农户、村民、山民、渔民和土著居民在内全世界范围内的平头百姓，则完全有可能沦为“可持续发展”游戏的旁观者和牺牲品。对于人类学者来说，从可持续发展模式到建设生态文明目标的提出，预示着全新挑战和契机的来临。如何对精英话语保持冷静的头脑，尊重普通民众的文化形态和生存权利，倾听和接受他们对包括“公地悲剧”和生态保护等“发展”问题的不同看法和立场，理解他们为维护自身文化完整和个体尊严所作的努力，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公共议题。

潘天舒 于花园城  
2013年6月23日

# 目录

## 本期话题：科技 话语 生产实践 1

---

-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谈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奶粉事件 .....2
- 中国都市环境中的母乳喂养研究综述 .....10
- 村庄里的大棚：寿光模式的人类学思考 .....19
- 农业“绿色革命”得失散议 .....39

## 环境 资源 可持续发展 48

---

- 从“公地悲剧”看自然资源管理 .....49
- 环境人类学：农村发展理论与方法 .....56

## 活动掠影 62

---

- 失范社会是否已经来临：道德底线的突破及其伦理意涵 .....63
- 有机食品田野掠影 .....67
- 复旦大学第二届人类学日 .....71
- “文化基因”，叙事模板和国家记忆 .....73

## ※本期话题※

#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谈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问题奶粉事件辨析

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剑峰

2008年9月，三聚氰胺奶粉事件震惊全国，世界注目。其实，早在数月前，某些地区就已经发生较多婴幼儿出现不明原因并集中罹患肾结石的现象。当时，在分析病因时，有人曾联想到奶粉问题(因为婴幼儿的主要食物是奶粉)，并对可疑奶粉进行了检测。遗憾的是，当时得到的结果是：被检奶粉合格。这就把人们的视线引入歧途，放松了对奶粉的进一步追查，最终导致数月后问题在十几个省范围内的大爆发。问题爆发后，由于在患儿尿液中发现三聚氰胺的代谢物，然后倒推检测，才算查明事情的真相：在奶粉中混入了三聚氰胺！于是人们责问检测部门：原来合格的奶粉合的是什么格？为什么没有发现其中的三聚氰胺？这必将涉及到现行的质检技术以及标准化制度等深层次的问题，也正是在一种突发事件出现的情况下，人们开始从社会的角度重新审视科技的问题。

和其他西方现代学科相似，食品科学以及营养学的基础正是相信客观能够完全脱离于主观，科学地存在。在此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科技工作者致力于追寻纯净的客观物质，统一的客观理论，而人们往往忽视了正是在此过程中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实验室的工作正是理想状态下的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中介所在。笔者接触的许多中国、美国实验室工作人员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也在积极地参与创作这个世界，而并不是纯粹的客观性研究。问题奶粉事件，再一次证明现实生活中，任何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个体，包括人、动物、植物，甚至是实验室中的仪器，都以各自的存在和活动参与社会现实的建构。这也正是法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ANT(Actor-Network-Theory)理论的精髓所在。本文试图通过他的理论，以网络为背景再现问题奶粉事件，并对其反映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思。为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理论背景，本文在第一部分将简要地介绍一下布鲁诺·拉图尔和他的ANT理论。

布鲁诺·拉图尔是法国著名的科学社会学、科学人类学家，在科技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1979年，布鲁诺拉图尔和史蒂夫伍尔格(Steve Woolgar)出版了《实验室的生活(Laboratory Life)》一书[1]，第一次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引进了科技学的研究领域，它展现了实验室的研究是如何通过科学家们的常规惯例性质的工作展开的，

其中包括做实验，发表论文，寻找课题及研究经费，以及其他一切微小琐碎不被人们关注的事件。该书的出版奠定了布鲁诺拉图尔在科技学领域的第一人类学者的地位，改变了科技学学科一直以来的哲学研究倾向。学者开始关注科学家们鲜活的实际科研生活，以及与外界的社会人际互动。之后，布鲁诺·拉图尔又相继出版了《我们从来不是现代的》(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2]，和《行动中的科学》(Science in Action)[3]，借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尽管有人将他对科学事件的研究列为社会建构论的方法论，美国当代科学人类学界普遍认为：布鲁诺·拉图尔和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约翰·劳(John Law)师承一派，是 Actor-Network-Theory 的奠基人和推动者。

Actor-Network-Theory, 简称 ANT, 它挑战了认识论中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命题。该理论并不认为主体与客体、文化与自然、社会与科技之间有根本的划分和不同。首先，无论是人还是技术，各自的孤立存在是不具意义的。他们的意义体现在与其他个体的联系之中，正如约翰·劳所说，If differences exist it is because they are generated in the relations that produce them. Not because they exist, as it were, in the order of things, 即不同存在于制造不同的社会关系中，而不是存在于不同的秩序中[4]。个体行动者不是停滞的、固定的，而是根据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同其他个体的关系而不断变化的。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个体包括人和技术都不是清晰的、稳定的，而是模糊的、多变的。以问题奶粉事件中的三聚氰胺为例，化工词典给予的解释是：一种三嗪类含氮杂环有机化合物[5]。这种精髓式的解释与存在本身并不能带来任何现有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它真正存在的意义却是当它与其他物质发生关系的时候，改变了现有的秩序。比如，当它用于制造业，可与甲醛发生反应，形成三聚氰胺甲醛树脂；当它被不法分子用于食品工业，可以提高食品的含氮量，作为伪蛋白，以达到凯氏定氮法所测蛋白质含量的技术指标的目的；当它进入人体肾细胞中，和氰尿酸相遇，形成结晶体，沉积形成肾结石。在上述三种不同的关系中，三聚氰胺展现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要了解什么是三聚氰胺，必须把它放置在动态的关系网络之中，而不能孤立地谈论所谓的特质或毒性。

其次，为了批判性地对待科学技术，ANT 将人和非人的科技、机构、市场主体等在认知论的层次上都称为 Actor(行动者)，他们都具有同样的行动能力。人的能动性很容易理解，而 ANT 提出的物的能动性就不那么显而易见。约翰·劳和米歇尔·卡隆给出了目前被学术界广泛引用的电话的例子来说明物的能动性。电话表面上是



普通的被动的装置，但当它响铃的时候，它的被动形象就改变了，即使人们决定不接听，电话仍然激起了人进行决策的过程和反应。在这个例子中，电话就脱离了人而具有能动性[6]。从 ANT 出发，看待在问题奶粉事件中的凯氏测氮法，它就不仅仅是检测食品中蛋白质含量的一种被动状态下的技术手段，它本身也具有能动性(agency)，因为它直接引起了很多其他社会成员的决策行动：如何增加奶产品中的含氮量？把技术和其他传统意义上的客体赋予主体性，有利于我们用动态的观点来审视网络中的每一种关系及整个网络的复杂性。

应用 ANT 理论思考蛋白质含量的检测技术，即把该技术看作是整个网络的一个行动者，可以有效地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从而最大限度避免科学简化主义带来的弊病。在问题奶粉事件中，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乳制品网络：奶源(奶牛、奶农、养牛场)、乳制品加工企业、奶制品供应商、国家质量检测机构、销售商、消费者、医院等。这个网络建立的基础是高蛋白乳制品可以提高婴儿的身体素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网络中那些被认为是自然的而非社会的因素，比如科技活动、实验室工作等，人们往往并不细究其复杂的过程，而是将之作为一个不需解析的整体拿来讨论。这被布鲁诺·拉图尔称为黑箱化(blackboxing)，即如布鲁诺拉图尔指出的：科技的成功掩盖了它工作的过程。当一部机器有效地运转，当一个事实稳定地存在，人们只注意到它的输入数据和产出结果，而不追究其内部的复杂性工作。因此，科技越成功，它们就越不透明，越晦暗[7]。譬如，该乳制品网络中的质量检验的实验室中的技术问题凯氏定氮法。人们很少在意从事检测的科技人员在实验室中是如何进行凯氏定氮法的研究工作的，而只讨论其所出具的结果。从 ANT 出发，这一系列的研究、实验过程都是我们科学学者所应关注的，其中还要包括它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它的创始人的实验室活动的研究。

1883 年，丹麦化学家约翰基耶达(Johan Kjeldahl)提出将蛋白质经过一系列化学处理，把蛋白质中的代表性元素氮剥离出来，转化为结构简单的小分子铵盐。然后通过检测铵盐的含量，再乘以系数，最后折算出原样品中蛋白质的含量。这显然是采用一种间接的方法。由于它解决了当时检测蛋白质的重大技术难题，而得到认可与肯定。由于这个方法符合标准应具备的科学性、准确性、可操作性、可重现性，兼顾简便性和普及性，而被确定为检测蛋白质的国际通行的标准方法，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当谈论凯氏定氮法与问题奶粉事件的联系时，无论是从事分析检测的科技工作者还是普通的消费者，都会认为它只是一个游离于主观世界之外的科技问题。显然，凯氏定氮法并不能鉴别最终形成铵盐的氮到底是来自蛋白质或是其他含氮的物质，是不法分子、无良企业利用标准上的漏洞，在奶粉生产的可能环节中加入了含氮量很高的三聚氰胺，将掺假奶粉变成优质奶粉而引起了悲剧的发生。这种评论反映了人们在潜意识中是将技术作为无能动的客体对待的，也即经是好经，只是让歪嘴和尚念歪了，技术是好技术，只是让坏人利用了。可是这种看法恰恰忽视了这个世界是由和尚念经、人利用技术等一系列行动构成的，而不是经和和尚，人和技术，主体和客体两个独立可分的世界构成的。

ANT 认为在网络中，由于每一个演员都具有行动的能力与各自的利益。因此网络的稳定性就取决于各个行动者利益的不断协调(translation)。而人与人之间的协调类似于共同利益的协商，人与物之间的协调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ANT 认为，一项科技创新和发展本身就是同网络中的行动者的协调过程。研究的资助者、研究的目的及过程、研究的社会背景等因素的不同可直接影响到技术的选定。以凯氏定氮法为例，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基耶达当年承担的科研项目是检测用于酿造啤酒的不同谷物的蛋白质含量蛋白质含量越少，酿造的啤酒越多。在有限的资料中，我们得知，当时基耶达受啤酒酿造商之托，从事啤酒生产的工业分析。他的主要任务是测定啤酒及麦芽汁中提纯的酒精含量，并需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系列的氮测定[8]。因此，笔者推断，当时基耶达研究的目的可能不是把蛋白质含量作为一种营养成分，而是将其作为影响啤酒的酿制工艺和出酒率的因素之一来考虑的。然而，在检测奶粉及其他奶制品时，蛋白质的含量则是作为一种主要营养成分指标的蛋白质含量越高，质量越好。这与基耶达的研究出发点酿酒原料中的蛋白质含量越高，酿造啤酒越少，正好相反。凯氏定氮法产生的详细研究过程资料的欠缺，尤其是研究过程中的琐碎的不为人注意的小事，比如当时的技术条件、设备的局限、人员的常规工作情况等等，从另一侧面反映出 ANT 理论的重要性。因为物的局限性恰恰是其行动能力的体现，它使得其他行动者的意图受阻，而必须与之协商进一步的行动计划。

问题奶粉突发事件将原有的乳制品网络的稳定性打破了，作为行动者的凯氏定氮法的检测能力自然受到了质疑。人们突然意识到了凯氏定氮法作为检测食品中蛋白质含量的标准方法，是以样品中不含蛋白质以外的其他含氮化合物为前提，而这种前提产生的时代背景并没有被明确地指出来。更为重要的是在紧接下来的一系列

技术改进的提议中，大家始终是把检测方法作为一种被动的研究对象。可是我们忘记了，正是在凯氏定氮法与其他行动者的联系过程中，人们才会想到添加三聚氰胺，而这一点正是科技的能动性的体现。科技工作者开始研究该技术的缺陷，认为它在100多年前被提出，完全适应当时的科技水平，为蛋白质的检测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可作为乳制品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形成相对稳定的网络。随着科技和社会因素的发展与变异，原来稳定的网络被打破，人们必须通过改变网络某一节点元素的结构，通过协调，产生新的相对稳定。

在问题奶粉事件之后，国家标准和质检管理部门正在组织修订乳制品的有关标准，将三聚氰胺列为必检项目，并公布三聚氰胺的检测方法。然而，任何正常的产品中所含的固有成分和允许添加的成分都是有限的，而不允许存在或添加的成分却几乎是无限的。他们认为将三聚氰胺列为奶粉的必检项目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将三聚氰胺作为蛋白精加入食品，这一行业性的秘密被揭穿以后，三聚氰胺成了过街老鼠，注目的焦点。可以预测，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再敢向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但谁又能保证不会出现四聚、五聚之类的新玩意呢？随着科技发展，新的物质正在源源不断地被发现、被合成，总不能把几乎无限多的不允许添加物质的名单都列入标准，都一一检测吧？

笔者在与分析测试方面的专家讨论的过程中，了解到他们的建议。根据目前科技水平的发展，可以采用两种新的方法检测食品中的蛋白质：第一种方法：鉴于可以直接检测蛋白质的仪器高效液相色谱高分辨率质谱联用仪(HPLC-IT-TOF)目前已有商品化问世，可用该设备直接检测食品中的蛋白质。但是该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①样品前处理复杂，要求尽可能除去样品中蛋白质以外的其他杂质；②仪器价格高昂(数百万元)；③运行成本极高。目前只在少数研究机构配备这种仪器，短时间内难以普及，以此建立标准的时机尚不够成熟。第二种方法：需要将蛋白质中的氮一直转化到铵盐，将样品在近似于人胃酸度的条件下进行处理，使蛋白质水解成为18种氨基酸，然后用高效液相色谱仪分析各种氨基酸的相对含量，最后再以氨基酸的相对含量推算蛋白质含量。由于在这种条件下，其他含氮物质不可能生成氨基酸。在此基础上再用凯氏定氮法检测一下总氮，如果根据总氮含量折算的蛋白质的含量大大高于由氨基酸折算的蛋白质含量，真相即刻一目了然样品中肯定添加了伪蛋白。这样设计出的标准就更加科学，漏洞要小得多。高效液相色谱仪的价格不算很高(10万元以下)，一般企业完全可以买得起，具备普及条件。

笔者深信，由于问题奶粉事件对人们健康的影响，不久一定会有新的技术来弥补凯氏定氮法的不足。假设某一项提议得到了支持，并付诸实践，展现在大众面前的就又是一项科技创新或发展，乳制品网络就会重新稳定。但是如果缺乏科学学、科学人类学，尤其是 ANT 对此项技术的研究，多年后，我们可能又忘记了这项技术产生的过程，忘记了技术是行为者，是具有行动能力的，而把它作为一项被动的客体对待，从而将社会与科技、人与物分离起来，好像科技是存在于没有文化的真空状态中。这样的弊端在于，没有把社会问题与科技问题放在同一平台上综合讨论，因而难以有效避免各个环节的脱钩。

在乳制品网络中，奶粉和凯氏定氮法这两个行动者是通过相关标准设立而彼此发生互动关系的。在这个过程中，就牵扯到了另外的行动者，即国家。国家标准 GB/T 5009.12003[9]规定检测食品中的蛋白质采用凯氏定氮法。在这一与国家标准制定者互动中，凯氏定氮法被赋予了法律意义，这不同于它在实验室中和其他行动者的动态关系。就如同一个人穿上了法官的制服，他的角色和行动就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就成为国家公权力的行为者。作为标准方法，凯氏定氮法在于乳制品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的互动中，就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控制权力，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它同时也体现了现代权力对标准化、科学化、统一化的逻辑理念的追求。比如，国家标准 GB/T3935.11996 对标准化做出这样的定义：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实际的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的活动[10]。因此，作为标准方法的凯氏定氮法，必然要掩盖其产生的具体而特殊的社会历史政治条件，而展现其客观性、广泛性和通用性。

在问题奶粉事件引起的一系列有关食品安全、信任危机的反思中，在指责无良企业的违法和个别官僚机构的渎职行为时，人们认为添加伪蛋白和防止添加伪蛋白本身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因此，人们提议：在设计标准时，既要考虑冷冰冰、硬邦邦的易于量化的自然科学技术因素，又要考虑鲜活多变的难以量化的人文社会因素。人们要求在发展中不断完善标准，政府主管标准化和标准管理工作的部门要及时淘汰过时的老标准，组织设计制定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新标准。笔者认为，这一系列的良好愿望仍然是建立在将自然与人文、客体与主体分离的现代二元论基础之上。这种二元论哲学体系是现代权力制度运行的基础。标准化制度正是现代管理模式的典型代表。它的局限性在于掩盖了世界的多样性、多变性、特殊性和具体性。布鲁诺·拉图尔认为[2]，现代社会正是不断地创造一个纯粹的客观世界。然而，它

试图掩盖的却是客观世界被分离的一系列动态过程，包括人的活动也包括物的活动。可是恰恰是在这一过程净化(purification)中，产生出许许多多的自然与社会、科技与文化的混合体(hybrid)来。现代社会的问题更多展现的是复杂的网络，比如环境问题，早已超越了科技领域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这种复杂性也从问题奶粉事件中得以体现。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行为者的活动都会引起整个网络的不安与躁动。当一个社会越来越现代的时候，人们会发现人和物、科技与社会越来越融合。如果我们还固守西方二元论的哲学思想去观察认知世界，我们就会感到疑惑和迷茫。

表面上，ANT 赋予我们一个社会学的视角去观察认识科学技术，但是它更为深层的意义却在于：它打破了社会(society)和自然(nature)的绝对意义上的区分。正如布鲁诺·拉图尔在他的《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一书[2]中指出的：任何世界上事情都是两者的杂交体(hybrid)。布鲁诺拉图尔进一步挑战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严格意义上的所谓社会抑或社会性的，因为这种提法本身就建立在社会和自然的区分的假设基础之上，似乎是存在人和物两个有本质区别的世界。其区别在于人是主体，物是客体；人有主观性，物只有客观性；人可主动地改变物，物只是被动地接受改变。ANT 的发展赋予物和人同等的能动性，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二元论的哲学思想，从而避免了 sociologism 和 technologism 两种极端的出现。布鲁诺拉图尔认为社会是科技的社会，科技是社会的科技。正如他所言，我们从未面临客体(objects)或者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我们面对的是人和物组成的链(chain which are associations of humans and non-humans)没有人见过纯粹的单一的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 by itself)也没有纯粹的单一的科技关系(technical relation)[11]。从问题奶粉事件中凸现出的乳制品网络恰恰展示出了这个复杂的科技社会的现实世界。将科技仅仅作为受动的客体，不去深究其产生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甚至是文化条件；同样，将社会分离于科技之外，不把科技作为重要的社会行动者，而照搬挪用具体的技术与社会制度，都必将引起一系列的无法预知的科技社会问题。

#### 参考文献：

- [1]Latour Bruno, Woolgar Steve. 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M]. Beverly Hills & London: Sage, 1979.
- [2]Latour Bruno.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M]. London: Prentice Hall, 1993.
- [3]Latour Bruno.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 Society[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4]Law John. Networks, Relations, Cyborgs: On the Social Study of Technology(draft)[Z]. Lancaster University: Centre for Social Studies and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ccessed: September 29, 2008.
- [5]化学化工大辞典：下[K].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1978.
- [6]Callon Mitch, Law John. Agency and the Hybrid Collectif[J].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994(2): 481-505.
- [7]Latour Bruno. 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8]魏天俊，冯光琰，刘景清.氮的有机元素分析历史和基耶达的贡献[J].大学化学，1997(12): 3.
- [9]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GB/T 5009.1-2003 食品中蛋白质的检测方法[S].
-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GB/T 3935.1-1996 标准化和有关领域的通用术语第一部分：基本术语[S].
- [11]Latour Bruno. Technology Is Society Made Durable[C]//John Law ed. A sociology of Monsters: Essays on Power Technology and Dominaton. London: Routledge, 101-131.^NU1DA20091028

# 中国都市环境下的母乳喂养研究综述

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 2008 级硕士生 洪浩翰

## 一、引言

### 1、中国母乳喂养率的变化

1949 年建国后（整个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母乳喂养曾经非常普遍，孕期、产假以及工间哺乳的制度安排在国际世界倍受美誉，在国际母乳喂养率下滑的年代中国的情况可谓独树一帜（Pasternak and Wang, 1985）。母乳喂养是当时中国妈妈哺育宝宝的最主要的方式。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母乳喂养率呈迅速下降态势（朱丽萍，1997）。根据 1990 年对 8 城市的调查来看，我国城市母乳喂养率已经从 50 年代、60 年代 80%迅速下滑至 30%左右，其中北京市低至 10.4%（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1992）。

从 90 年代开始，国际卫生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始推广爱婴医院，爱婴医院在产前与产后都提供鼓励母乳喂养的环境与制度设置（United Nations, 1996）。在中国，从 1992 年到 2000 年之间，有超过五千家医院得到“爱婴医院”的标准考核（Yuan, 1997）。之后，中国的母乳喂养率有所提升。1998 年的调查数据显示，4 个月以内婴儿纯母乳喂养率城市为 53.7%，农村为 71.5%（富振英等，2000）。

而到了 21 世纪前十年，中国母乳喂养率又发生了下滑的趋势，2003 年，全国 5 省市 10 个城市社区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显示，10 个城市社区的 4 个月母乳喂养率平均为 45.3%（刘克玲，2003）。2008 年的“三鹿奶粉事件”所揭示事实，中国的配方奶的流行已经不限于东部发达省份的城市区域，从受害者的范围来看，中西部省份甚至农村地区一样是重灾区。

### 2、配方奶工业的发展轨迹

解放初期我国只有全脂奶粉和全脂加糖奶粉。1976 年国家轻工业部将研制“婴儿奶粉”的任务下达给黑龙江省乳品工业研究所，当时在全脂加糖奶粉的基础上研究定名为“婴儿配方奶粉 I”的婴儿主食品。20 世纪 80 年代初国务院为了解决“娃娃吃饭难”问题，将“配制奶粉”的研究作为“六五”期间重点攻关项目，该课题于

1985 年国家通过验收, 1987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此产品在国内市场定名为“婴儿配方奶粉 II”的婴儿配方奶粉(艾宇萍 & 艾长余, 2004), 也称作母乳化奶粉, 其中, 乳清蛋白与酪蛋白的比例为 60 : 40, 提高乳糖含量至总糖的 90%, 添加植物油以增加不饱和脂肪酸, 使之接近人乳的成分。

随着改革开放, 婴儿配方奶粉的市场需求持续加剧。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初, 中国的乳品行业年均增长速度为 15% (艾长余 艾宇萍, 2004), 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境地, 极大的鼓舞了国内乳品行业超常速度的扩张, 以及国外乳业巨头的入侵。中国配方奶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小规模到产业化和标准化生产来应对市场消费的历史性转型。

## 二、田野研究综述

### 1、苏珊葛倩 (Suzanne Gottschang) 的都市母乳喂养研究

1996 年, 苏珊葛倩对中国都市的母乳喂养展开的田野调查, 随后完成了相关主题的博士论文, 而田野调查的地点在中国北京(Suzanne Gottschang, 2007)。葛倩在论文中谈到中国母乳喂养率持续下降的背后, 有两个显著宏观的社会背景: 1、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 培育出了一个市场导向的经济格局, 商业力量的侵入开始赋予母乳喂养以新的意义; 2、在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大力倡导下, 中国政府开始建立“爱婴医院”并大力倡导科学母乳喂养, 试图通过医疗机构与科学的力量给母乳喂养赋予新的意义。一方面, 医疗机构通过生物医学的视角, 把母乳定义为婴儿最自然最科学最有营养的食物的同时, 却忽视母乳喂养的实际社会情景与社会经济结构。哺育婴儿的母亲同样也是他人的妻子, 是事业中的合作者, 是家庭中的成员, 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制约着母乳喂养行为, 同时也给母乳喂养赋予不同的意义。另一方面, 消费主义的兴起与市场经济格局的形成, 母乳喂养的选择带来了新的变化。以盈利为导向的企业的增多要求更加勤勉的员工, 面对这样的结构压力, 很多都市母亲选择缩短母乳喂养时间, 以期留住工作机会与避免家庭陷入过大的经济危机; 这为母乳替代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配方奶厂家不遗余力的通过广告来宣传自己的产品, 甚至直接面对医院产房的妇女赠送奶粉样品; 与此同时, 女性对于自己的身材美貌越来越重视, 中国妇女不在是革命年代的“铁姑娘”, 她们开始关注自己的性生活, 母乳喂养被视为致使身材走样, 乳房下垂的“元凶”。商品与



市场的叠加因素都丰富了母乳喂养意义，改变了母乳喂养的实际行为。

## 2、Diana Martin 的香港孕妇饮食禁忌研究

2000 年，戴安娜·马丁完成了一项关于香港妈妈产前食物禁忌的研究（Diana Martin, 2001）。在香港这一华人世界西化程度极高的地区，现代生物医学模式可谓深入人心，故而产前检查等一系列医疗制度有极高的普及率。然而即便如此，香港地区的孕期产妇依旧会遵循中国传统医疗知识来指导孕期饮食与孕期活动。戴安娜借助人类学仪式过程的经典理论，解释了香港产妇同时接受两套医疗知识背后的逻辑。对于笔者来说，这项研究的借鉴意义在于，在一个医学知识标准化与全球化的今日中国都市，本土的医疗知识会如何赋予母乳喂养于特殊的意义？而这种意义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理解当下中国的育儿实践的文化基础？对于特定语境中的母乳喂养实践又有何影响？

## 三、相关理论回顾

### 1、社会的医疗化（Medicalization）

医疗化社会这个学术术语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社会科学著作与医学专业刊物中（Conrad, 2007）。社会的医疗化描述了这样一种社会过程，由职业医生群体与医疗机构共同组成了医疗权威进入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控制的力量。对于医疗与公共健康机构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与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有很多的著述（Foucault, 1965; Szasz, 1970）。而 1973 年康纳德对于儿童注意力缺乏病的研究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他的论文《发现小儿多动症：对于偏差行为的医疗化笔记》（Conrad, 1973）。揭示了整个专业医疗力量是如何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建构出新的医学事实。社会医疗化通过不断的扩展病理学术语去涵盖新的情况与行为，医疗过程必须将扩大的社会领域的行为结合到生物医学治疗的范围中。诊所、健康护理机构以及其他的提供医疗的组织已经进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Merrill Singer & Hans Baer, 1995）。在人类的生育领域中，社会的医疗化集中表现为，把分娩生理过程曲解为一项病理学的事件，同时故意的无视分娩作为孕妇及其家属的一项重大的心理事件。具体的包括如下方面：（1）对产妇隐瞒医疗方面不利的信息；（2）预测妇女的在医院的临产期；（3）无关紧要的人工引导分娩；（4）

分娩期间，将产妇与其家属分离；（5）把分娩的妇女固定在床上；（6）职业性的依靠技术与药物的方法来缓解疼痛；（7）常规性的电子胎儿监测；（8）利用化学药物来刺激分娩；（9）分娩必须有医生在场；（10）要求产妇采用平卧的姿势而非蹲式；（11）对分娩进行常规性的局部或整体麻醉；（12）常规的外阴侧切术（Haire,1978）。而现在来看，这些医疗化实践对生育的侵入还包括了越来越多的剖宫产手术（Karen Mazurkewich, 2004）。

妇女分娩地点从家庭卧室到医院产科病房的转变标志着医疗化在人类生育领域的普及。以美国为例，1900年只有占总出生率5%的婴儿在医院诞生，而到了1935年，有近乎75%的都市婴儿在医院诞生，从总出生率来看，超过50%的婴儿都在医院出生（Wertz & Wertz,1977）。与此相伴随的是，医疗机构的进一步扩大以及产科职业医师与病床总数的迅速提高（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28-1941）。

伴随着分娩医疗化的持续加剧，人类的母乳喂养行为也不可抗拒的受到了医疗化的影响。现代医学是一种对象化的活动，深刻植根于笛卡尔身心二元的哲学思想之中（Scheper-Hughes & Lock, 1987）。这种对象性的哲学思想渗透在医疗化实践中，也根本上重塑了母乳喂养的意义与社会价值（Viviana A. Zelizer, 1985），母乳作为一种身体的产品，在进化的视角来看，是人类原始状态的遗存，是可以被科学“进化”的。从19世纪中后期一直到上个世纪的早期，母乳喂养都被中产阶级白人妇女视为一种不科学的肮脏与低贱的劳役，一种动物般的行为（Golden Janet, 1996）。当时的上中层妇女倾向于雇佣奶妈来喂养婴儿，而中产阶级也普遍使用代乳品喂养婴儿，从而成功地把喂养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对象化的物质过程。

## 2、消费主义与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 Consumerism)

商品化（Commodification）是一种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将物品与服务转变成为可以出售的商品的过程，而其中有一些事物我们日常并不视其为物品与服务（Karl Polanyi, 2001）。而消费主义（Consumerism）则是一种经济社会秩序，这种秩序系统化的创造与培育出从未有过的购买与消费的欲望（Britannica Concise Encyclopedia Online, 2008）。

伴随社会的医疗化，商业力量始终围绕着妇女生育过程左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史资料显示，绝大多数中上层妇女已经接受雇佣外科医生

“新产婆”协助分娩，与现在不同的是，她们都选择雇佣外科医生到家中协助分娩（Litoff,1978）。吸引妇女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外科医生宣传可以提供麻药来缓解产妇的疼痛，他们收费很昂贵是普通产婆的 4 倍。因此，当时他们主要服务的是上中层妇女（Ladies’ Home Journal, Sep.1930）。带着明显的逐利动机，职业医师希望能够把产妇安排到医院来分娩，这样他们能够接受，并处理更多的病人，同时让这些病人用上收费更昂贵且不宜随身携带的医疗设备（Melissa A. Thomasson & Jaret Treber, 2006）。

在产科病房的医疗实践中，商业力量成功的塑造除了一种“由供给方引导的需求”（supplier-induced demand），举例而言，1970 年到 1982 年的数据显示由产科引导顺产率逐渐下滑，并被越来越多的剖宫产所替代（Gruber & Owings, 1996）。相似的案例，更早的发生在现代产科建立的早期，1915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父亲年收入低于 450 美元的婴儿，出生时候使用产钳的比率只有 4.3%，对于父亲年收入高于 1850 美元的婴儿，14.2%的产钳使用率（Woodbury,1925）。相同的数据也展现在，产科会阴侧切手术的比率中，25%的低收入家庭产妇在分娩中用到了该手术，对比超过 50%的高收入（2000 美元以上）家庭产妇手术率（Goddard,1941）。

商业力量除了不断添加新的手术在整个分娩的过程中，同样的力量一样作用在产后恢复期中。医院开始更加重视顾客的服务，提供给产妇一个比家里更舒适更便捷的休养场所。1、提供专业的护理人员，培训更多的护理人员加入到医院中，提供护理、喂养、清洗等服务；2、提供更长的休养期，一般产妇可以获得两周到一个月的住院休养期（Wertz & Wertz, 1977）。

上个世纪初，西方喂养婴儿的实践也受到了明显商品化与消费主义的影响。医院除了提供常驻在医院的奶妈喂养服务外，悄然兴起了“人奶银行”（Milk Bank），统一甄选、采集、消毒、包装、运输与销售，到 1929 年为止，已经有 20 多个美国城市出现了“人奶银行”（B. Raymond Hoobler, 1914）。“银行”主要服务的对象是美国上中层妇女，而提供人奶的绝大多数是底层劳动妇女。

当时，销售自己的母乳也成为了一项不错的生意，极端的例子发生在 1925 年，一位妇女在 14 个月期间连续销售自己的母乳获利达 3500 美元，据称该妇女故意让自己不断怀孕以期待销售自己的奶水牟利（B. Raymond Hoobler, 1925）。除了母乳本身的成功商品化以外，消费主义也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在代乳品行业获得巨大的

成功。从 19 世纪末开始，人造的婴儿食品，典型如配方奶粉（动物的奶制取物与淀粉水的混合物）不断改进质量开拓市场，被广大消费者所接受，被认为是一种安全的、科学的、而且相比与雇佣奶妈来说是价格低廉的选择（Golden Janet, 1996）。

### 3、育儿文化的全球化

19 世纪末开始，受到笛卡尔身心二元哲学（Scheper-Hughes & Lock, 1987）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西方世界的育儿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母乳喂养被看作一种未进化的动物状态（Golden Janet, 1996）。对于科学与理性的信仰，使得大部分西方母亲都相信代乳品是一种更为科学的喂养方式。而现代工业的组织方式，又使得母亲的角色渐渐被抹平，人工代乳品的流行不难理解。而对于中国来说，西方世界备受推崇的科学喂养方式并没有影响到中国妇女的喂养行为，从晚清一直到 1950 年间，中国的母乳喂养一直保持了非常高的比率

（Charlotte Furth, 1987、Pasternak and Wang, 1985）。

1950 年后，西方的育儿文化又发生一次深远的转变。二战结束，美国引来了历史上的生育高峰，史称婴儿潮，历史学家艾莲娜梅尔把那个时间成为“母亲膜拜的复兴”，冷战期间，大量的受过教育的妇女成为了专职家庭妇女，她们专注于家务活动（Elaine Tyler May, 1988），学习各种先进的家务技术，做母亲成为了一种职业。母亲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身份，喂养婴儿的行为也成为了伟大母亲的职责，母乳喂养不在是不科学的了，而是崇高的（Rickie Solinger, 1992；Viviana A. Zelizer, 1985）。

到了上个世纪 70 年代后，西方世界开始限制母乳替代品的商业推广。比较著名的是雀巢抵制案（Nestlé boycott, 1977）。到了上个世纪 80 年代，这个抵制从美洲大陆扩展到欧洲，并引发了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的关注与参与，通过世界各地的媒体、通过各地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努力。1981 年 WHO（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 International Code of Marketing of Breast milk Substitutes (国际母乳替代品市场公约)。公约条款中，明确了母乳喂养对于人类健康的重要性以及不可替代性，对于母乳替代品给予了明确的限定，指出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比如母亲携带 HIV、极个别母亲生理上的障碍），才可以使用母乳替代品喂养儿童。

2001 年，世界卫生组织更是通过一项公约要求世界各地的母亲超过六个月的纯母乳喂养时间（Van Esterik, 2002）。西方母乳喂养的育儿方式在上个世纪中叶获得

了道德话语，而到了世纪末得到生物医学的支持，成为了西方最主要的喂养方式并借助国际组织的力量对世界各地产生影响，全球化正在迅速抹平既存在世界各地的关于婴儿哺育方式的差异性。

#### 四、研究展望

在社会医疗化、消费主义与商品化、全球化与地方转型等理论框架下，以实地田野考察和分析为主要研究手段，对母乳喂养意义变迁的过程进行事件“诊断”与意义“浓描”，从而透射出中国宏观社会结构与制度转型以及全球化对于传统育儿实践的冲击与影响，这对于理解和探索中国地方育儿文化过程所产生的问题具有不容低估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 [1] 艾宇萍,艾长余.2004. 我国婴儿配方奶粉发展历史 简要回顾及内在质量分析.中国乳品工业.第 32 卷第 4 期(总第 161 期):26
- [2] 艾长余 艾宇萍.2004. 我国婴儿配方奶粉现状及其发展前景的初探.中国供销商情(乳业导刊). 2004(2):11
- [3] 富振英,常素英,何武,等.2000.1998 年中国 4 个月以内婴儿纯母乳喂养与生长发育.卫生研究,29(5):275.278.
- [4] 刘克玲,张德英,王斌,等.2003.中国部分城市婴幼儿母亲的养育行为调查.中国妇幼保健,18(2):114.116.
- [5] 朱丽萍.1997.影响母乳喂养的因素.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13(2):69.74.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1992.《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
- [6]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28<1941.Council on Medical Education, 1928–1941. Hospital Serv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various issues.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Chicago.
- [7] B. Raymond Hoobler. 1914. "An Experiment in the Collection of Human Milk for Hospital and Dispensary Uses," Archives of Pediatrics 31: 172<73.
- [8] B. Raymond Hoobler. 1925. "Human Milk: Its Commerci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84: 166.
- [9] Charlotte Furth. 1987. Concepts of Pregnancy,Child birth and Infancy in Ch'ing Dynasty

-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1):7<35.
- [10] Diana Martin. 2001. Food restrictions in pregnancy among Hong Kong Mothers. *Changing Chinese Foodways in Asia* Ed by David Y. H. Wu and Tan Chee<Be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March 15, 2001):97<122
- [11] Elaine Tyler May. 1988. *Homeward Bound: American Families in the Cold War Era* (New York); 140, 159.
- [12] Gruber, J., Owings, M., 1996. Physician financial incentives and cesarean section delivery.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7 (1), 99–123.
- [13] Goddard, J.C., 1941. Medical and nursing services for the maternal cases of the national health survey. U.S. Public Health Bulletin No. 264.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 [14] Haire,D. 1978. The Cultural Warping of Childbirth, In the Cultural Crisis of Modern Medicine. John Ehrenreich, ed: P185<200.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15] Janet Golden. 1996. *A Social History of Wet Nursing in America: From Breast to Bottle* (New York).
- [16] Karl Polanyi. 2001.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2 edition
- [17] Litoff, J.B., 1978. *American Midwives, 1860 to the Present*.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 [18] Karen Mazurkewich. 2004. Facing One<Child Rule, Chinese Top World in Caesareans. *Wall Street Journal*. (Eastern edition). New York, N.Y.: Aug 26, 2004. pg. B.1
- [19] *Ladies Home Journal*, various issues, 1930–1932.
- [20] Melissa A. Thomasson & Jaret Treber. 2006. From home to hospital: The evolution of childbirth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8–194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5 (2008) 76–99
- [21] Merrill Singer and Hans Baer.1995. *Critical Medical Anthropology*. Amiytyville, New York: Baywood Publishing Co.
- [22] Michel Foucault. 2006. *The History of Madness*. Routledge Press.
- [23] Moore, Sally F. 1978, *Law as Process: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London and Boston: Routlege.
- [24] Pasternak, B., and C. Wang.1985. Breastfeeding Decline in Urban China: An Exploratory Study. *Human Ecology* 13(4):433–466.
- [25] Peter Conrad.1973. *The Discovery of Hyperkinesis: Notes on the Medicalization of*

- Deviant Behavior. *Social Problems*, Vol. 23, No. 1. (Oct., 1975), pp. 12-21.
- [26] Peter Conrad. 2007. *The Medicalization of Societ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Conditions into Medical Disorder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 [27] Rickie Solinger. 1992. *Wake Up Little Susie: Single Pregnancy and Race Before Roe v. Wade* (New York), 148-86
- [28] Scheper-Hughes, N., & Lock, M. M. 1987. The mindful body: A prolegomenon to future work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1),6-41.
- [29] Suzanne Zhang Gottschang. 2007. Maternal Bodies, Breast-Feeding, and Consumer Desire in Urban China.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Vol. 21, Issue 1, pp. 64-80
- [30] Szasz, Thomas (1997 (1970)). *The Manufacture of Madnes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nquisition and the Mental Health Movement*. Syracuse,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31] Nestlé boycott. 1977. <http://www.babymilkaction.org/>.
- [32] United Nations. 1996. *Baby-Friendly Hospital Initiative Newsletter* 5:1.
- [33] Van Esterik. 2002. Contemporary Trends in Infant Feeding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1(October):257-278.
- [34] Viviana A. Zelizer. 1985. *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 The Changing Social Value of Children* (New York), 169-207.
- [35] Wertz, R.W., Wertz, D.C., 1977. *Lying-in: A History of Childbirth in America*.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 [36] Woodbury, R.M., 1925. *Causal factors in infant mortality: a statistical study based on investigations in eight cities*. U.S. Children's Bureau Publication No. 142.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 [37] Yuan, Xiaohong. 1997. *Baby-Friendly Action in China: Protection, Promotion, and Support of Breast-feed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ian Conference of Pediatricians, Hong Kong, June 15-17.

# 村庄里的大棚

——寿光模式的人类学思考

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 2009 级硕士生 董丽霞

## 一. 问题缘起：“寿光模式”的发展人类学解读

本研究所聚焦的田野地点是位于山东省寿光地区的平安村。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该村村民通过发展大棚蔬菜生产，过上了小康生活。如今，由 975 个“平安村”构成的寿光，也成为了全国首屈一指的集科研和产销为一体的蔬菜基地。其物流园也逐步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蔬菜集散市场、蔬菜价格形成中心、信息交易中心物流配送中心、最权威蔬菜标准形成中心。在产业化、机械化、市场化和集约化的发展策略的导引之下，寿光蔬菜远销欧盟、日韩等 20 多个国家。由于官方传媒的报道效应，每年有超过百万人来寿光考察和学习蔬菜产业化发展模式，同时寿光本地的农艺师也遍布世界各地。“寿光现象”在俨然成为依靠科技发展农业的中国“绿色革命”的成功典型的同时，也为发展人类学者的检视和反思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田野案例。

著名政治学者斯科特（Scott）在其《国家视角》一书对于“美蒂斯”（实用知识）的精彩阐述（Scott, 1998: 311-341），使他的宏大叙事，与人类学者的视野成功地吻合在了一起。斯科特对于实用知识与科学解释之间的差异、以及这种源自民间（如土著部落）的非正式知识传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瓦解的关注，使他研究的学理和应用价值体现出了强烈的前瞻性和植根性。斯科特所指的“美蒂斯”可以表述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调适性智慧”（adaptive wisdom）。这种调适性智慧使土著居民能够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土法”控制病虫害，从而避免了因盲目引进人工技术导致的化学污染和其他不良后果。而来自全球化边缘地带的文化传统和生存性智慧，完全有可能成为物种保护和均衡发展的关键因素。

如将斯科特早年完成的《弱者武器》与《国家视角》的观点加以重叠并置，使我们不难察觉到发展项目的两大相关因素，即官员是否具备基本的实践知识以及对社会和自然环境复杂情况的辨析能力，以及发展的受害者使用“弱者武器”形式表达不满和对诉求社会正义的策略。也就是说，任何忽视本地知识，体现一刀切式标准化的社会发展政策和措施，不管其改善大众福祉的本意是如何美好以及来自决策层



的努力是如何的坚韧，在实践中往往不仅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还会因为受到普通民众使用的所谓“弱者武器”进行抵抗而受挫。

本文所陈述的大棚产业化之前寿光致富之路的坎坷遭际，一方面印证了斯科特上述跨文化跨地域的深刻洞见，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领悟了以王乐义为代表的能人将调适性智慧发挥到极致之后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蔬菜大棚产业化在带来短期的经济利益之后，其进程开始逐渐受到来自政府、商业领域和科技界等多股结构性力量的掌控，从事大棚产业的农民沦为以规模化、科技化和市场化为导向的单一发展模式的被动接受者，失去了发挥调适性智慧的兴趣和动力。

在对发展的代价进行探讨之时，本文关注的焦点是大棚产业化对于寿光农村生态和社会环境所产生的难以预期的效果。在《人类学和当代人类问题》一书中，发展人类学者波德里对人类为盲目追求速度、效益而不计后果的发展模式，提出质疑并警告世人：人类正在为没有计划、不受制约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付出巨大代价(Bodley, 1999)。他《发展的受害者》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进步”的代名词，经济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生活品质、生态和医疗层面的巨大变化，其强度和速度之大，令人难以预测。而且人类为所谓进步付出的惨重代价将包括：新型疾病的发生和流行，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由于经济变化而带来的无法估量的损失(Bodley, 1991)。

如果说博德利高屋建瓴的见地，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改变现有发展模式对于解决大棚产业化带来的地方生态危机的重要意义，那么张乐天 and 阎云翔在对于人民公社后时期后中国农村转型的开拓性研究(张乐天, 1998; Yan, 2003)，则为深度探讨农村发展致富后的制度变迁所导致的地方文化生态环境的蜕变及其后果，提供了理想的田野坐标。

## 二. 平安村的自发致富之道：从“玩棚”到蔬菜产业化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见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乡政府在利益的驱使下对生产进行了有效的干预，如：通过倡导科学种田，组织村民统一采购种子和化肥，并采用在政府看来是相对先进的耕作方式这一系列的措施，在保证农民及时上交公粮的同时也极大的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加。随后政府以“自上而下”策略推出的富民项目，由于忽视了生物多样性、新形势下的市场因素以及

农民自身的能动性，未能到达普及新型科技种植经济作物、发展林业、调整农业结构的初衷。面对棉花田内出现的人虫大战、推销不出的蔬菜和荒芜的果园，驻村的乡镇干部渐渐地退出了村民们的视野，不再直接干预日常生产。

在发起蔬菜“白色”革命<sup>1</sup>的寿光第一“能人”王乐义的激励之下（郝德英，2006年），遭遇挫折的平安村民通过“玩棚”来寻找新的致富之道。到1999年全村已有208个冬暖式大棚，占地68649平方米，拱棚47个，占地23732平方米。冬暖式大棚的出现解决了北方冬天只有白菜萝卜的日子，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新鲜蔬菜。我们注意到：在冬暖式大棚的发展过程中，各级政府支持的态度始终如一。王乐义<sup>2</sup>在实验之初就得到县委书记的重视，项目成功后就促其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同年省委书记前来参观，希望能够将寿光的这一模式推广到全省乃至全国。2005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三元朱村考察党员干部带领农民共同致富的过程。寿光也因此成为党员保持先进性教育的联系点。政策的有力支持和政治资源，为蔬菜大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发展环境。

政府以科技带动农业的扶持政策在调整生产结构、扩大种植规模、资金支持、合理布局蔬菜种类、开拓国内外市场和推广科技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对于平安村来说，最大的改变莫过于大棚蔬菜种植的产业化及其连带效应。首先是生产要素的变化。1992年以来，平安村大棚迅速扩张，使粮田与经济田之间的比例矛盾加大。原先经济田与粮田的比例为4:6。到2001年，经济田中已经盖满蔬菜大棚。同时挖掘机的出现，使得蔬菜大棚的面积不再受人力限制，可以朝着更宽更长更高的方向发展。于是有村民在自己粮田中建第四代冬暖式大棚。而这一行动并没有受到村干部的限制，接着村里出现了十几户菜农的“合理”效仿。随着面积狭小的经济田与村民日益对建更多更大的大棚的需求之间矛盾加剧，平安村向乡政府提出了土地大调整的申请获得通过。经过这次土地调整，经济田与粮田的比例由4:6成为3:7。这使得平安村的蔬菜大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到2002年秋，95%的农户拥有了蔬菜大棚。其次是蔬菜种植的机械化和育苗的专业化。土地大调整以后，平安村掀起了建大棚的高潮。挖掘机和卷帘机的普遍使用让很多菜农从建大棚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且提高了劳动效率。然而随着设施机械化的发展，种植蔬菜大棚需要的成本

---

<sup>1</sup> “白色”革命：因为寿光的冬暖式大棚，为了充分的利用光照作用，在大棚的顶部覆盖白色的薄膜，当地大棚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像白色的海洋，当地人形象的将其称为蔬菜界的“白色”革命。

<sup>2</sup> 很多人提到寿光总会习惯性地把原因归于王乐义的弟弟王乐泉，这一关系的存在确实有助寿光蔬菜业的发展，但是人们的这种表面归因恰恰容易让人忽视作为“能人”的王乐义运用调适性智慧让当地农民致富的重要性。

也在增加。如：1992年建一个蔬菜大棚只要1000元，而现在建一个蔬菜大棚需要6万-8万元。与此同时，规模化种植使村民对于化肥和农药的需求与日俱增，最终催生了村内第一家农资超市。种苗场和种子公司开始在育苗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市场利益的强烈驱动下，农民将高端蔬菜作为种植品种的首选。



图1：寿光蔬菜博览会园区展示的新一代的大棚，造价在10万元左右。

大棚规模化经营还促使了蔬菜销售中介和加工行业的平行发展。如今菜农要卖菜，只需告知村里的蔬菜收购中介，就会有人到大棚里采摘，然后由收购商将蔬菜运往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同时政府还在平安村所属的古城街道设立收购市场，以利促销。有的收购商为了能够收到新鲜的西红柿，还会直接到某些菜农的家里采摘。有的蔬菜收购商每次到村里，都会先找关系比较好的菜农帮忙介绍农户，收购商也会给作为中间人的菜农一定的报酬，这部分菜农渐渐成了收购中介。蔬菜中介商除了帮收购商收购蔬菜，还承接加工。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村内年龄比较大的菜农和中老年妇女的生计问题。

蔬菜生产和加工过程的分离是平安村大棚种植规模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围绕蔬菜这个直接的连结点在村内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分工种类，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系统。这种产业化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内而外，自发长成的。因为“内发力量”而衍生的不同分工格局，正如一颗种子自己生根发芽，主动吸收需要的养分，长成一个小树，而并非由政府预先设计好一个完整的模式，直接复制推广而成。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充当一个保护人，也能够从中获取一定的利益，但是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拔苗助长；更不能非常霸道地使用“同一性”思维和“齐一化”概念，极

力以一元吞并多元，建立一种普世发展模式，在不同的地区直接推广，而忽视或压制本土模型。（乔治·迈尔逊，2005）

真正的“寿光现象”正是由此发展而来，它的农业产业化是由百万个农民的积极劳动加上政策的扶持，自发而成的产业化，这个产业化内部的每个农民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些个体都有自己的迷你小农场——大棚。而且他们能够在没有政府统一指导的情况下就意识到规模化的重要性，并积极自发地在同一个村落内种植同一种蔬菜，吸引蔬菜收购商。我们暂且称这种规模化为“小农户规模化。”在初期这种规模化经营并不需要大量的资本介入，农民种植蔬菜大棚，风险较小。

通过回溯平安村蔬菜大棚从无到有、从单纯种菜到产业化经营的整个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政府政策支持与农民的地方性知识和主观能动性这种上下结合在发展实践中的重要性。土地包产到户后，干部“包片蹲点”这一政府直接干预农业生产的策略虽然起到了指导农民科学种田的作用，但在尝试引导村民寻找致富之路上却屡屡碰壁。而“自上而下”的模式受挫之后，政府对农村的政策显出更大的灵活性，为农民中的“能人”摸索致富之路创造了契机。在农民群起仿效的情况下，政府又不失时机地在政策和资源上也给予支持，从而兴起了一场地方性的农业“白色革命”，并成为科技发展农业的典型。可以说，寿光的蔬菜大棚实践是源于20世纪50年代以增产增收和解决粮食问题为宗旨的农业“绿色革命”的最新翻版。然而，与半个多世纪之前其他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实践显著不同的，寿光的普通农民不是被动地接受农业科学技术，而是自己主动地走上了大社会所提倡的“农业产业化”的道路。在国际发展的比较视野中，这种政府政策与农民的实践知识相结合的农业发展模式在寿光已经取得可圈可点的阶段性成功。

### 三. 平安村大棚产业化的文化和社会效应

在发展人类学者看来，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农业绿色革命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施过程中，不但不能满足普通农民的需求，由此产生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趋势在更多时候拉大了原先存在的贫富差距（Dewalt, 1994）。而这一现实有违技术革命推广倡导者的初衷。绿色革命的赢家多半是化肥供应商、稻种供应商、农用机械设备制造商和营销商以及收入剧增的农业大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得到巨额研发资助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也是绿色革命和随后发生的农业企业化的赢家。

由于语境迥异，我们目前很难判定寿光是否会重蹈当年农业绿色革命的覆辙。然而借鉴来自发展人类学田野实践的洞见，我们仍然有必要对一味追求大干快上的当地致富模式所产生的一些未可预期的后果进行冷静的考察和判析。在两年多的田野调查中，笔者不时听闻寿光民谣中“要想死得快，就吃寿光菜”以及“寿光人上辈子赚钱，下辈子花”之类的说辞。有些当地人甚至说寿光大棚已经到了“后时代”。这些坊间流传的话语似乎显示出了“寿光现象”难于令人乐观的一面。作为研究者，我们应不失时机地反思寿光成功模式背后所隐藏的问题和潜在危机，并加以判析。

让我们先从平安村发生的一些关键性事件入手，在“社会学的想象力”的驱动之下（Mills, 1959），将存在于个体生活层面的细枝末节与宏大的社会结构性力量相联结，以加强和加深对于微观田野世界中呈现的寿光现象的理解。平安村的农民最初种植蔬菜大棚只是想改善经济条件，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随着“小村庄的大棚”走向世界市场，处在全球化和地方转型这两股“结构性力量”夹击之中的村民无法真正把握前行的方向。可以说，从开始自发地学习种植蔬菜大棚的那一刻起，农民们就自己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也就是说，在致富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未曾预期的问题，如：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市场利益的争夺、食品安全、社会道德、生态环境失衡等等。村庄内菜农的身体健康恶化、年轻劳力和智力人才的外流、养老机制的缺失以及日常人际交往模式的蜕变，都使得小村庄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蔬菜安全与道德底线的失守是大棚产业化引起的连锁效应中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作者在田野研究中发现：随着平安村种植蔬菜由追求“吃头”而转向“商品化”和技术化，农药、化肥在生产中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大棚发展之前在菜园里种蔬菜，基本是为了自给自足。而今种植蔬菜是一项为了增加现金收入的买卖。在土地的耕种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农户只能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并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大产出，因而化肥的使用已经必不可少。蔬菜大棚内都是单一品种种植，失去了原本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机制。蔬菜非常容易生病，迫使农户选择使用农药。而农药喷洒要多次才能起效，因为病虫害已经具有极强的抗药性。农药的更新换代也非常之快。但虫子对药物的适应性也在不断“升级”（卡森，2011）。面对“人虫大战”恶性循环中，农民只得在不同的生长期，提前喷洒不同品种的农药进行预防。

在田野调查中，菜农告诉作者，“八十年代末开始种植大棚时，多数人都是自学成才。种在大棚和菜园子里的菜是一样的。两者的唯一区别只是在大棚里的菜能充分利用光和作用，延长生长时间，而其种植技术没有变化。因为那时的蔬菜不像现

在这样有各种各样的病菌和虫害。从2000年开始，蔬菜开始受到诸如串皮虫、地蛾虫、根线虫等病菌虫害的侵袭。与之相关的药物也渐渐问世，尤其是剧毒、高残留的化学农药，如：1605、敌敌畏、‘黑药’<sup>3</sup>。”2005年左右，蔬菜安全问题的出现使政府明令禁用一大批剧毒农药，并同时鼓励使用生物农药。然而据农资超市的小张介绍，目前到黑市购买‘黑药’的情况依旧存在。因为有的农民到了治根线虫的季节，并没有用来购买生物农药的资金。如果她遇到菜农询问，一般得到的答案就是“我让人给弄了点黑药，一下子就治住了。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生物农药不但贵，而且灭杀根线虫时的效果也比不上‘黑药。’

当地菜农也并非不知道剧毒农药对身体有害。有的菜农会在自己的大棚里留出一部分蔬菜给自己吃。这部分蔬菜不会喷农药。作者在家的时候，经常会收到邻居们送来的蔬菜。他们都会说：“这是没打药的，长得不好看，但是吃着放心”。我们不禁疑惑：为什么菜农会在明知农药、化肥残留对身体有害的情况下还会“故伎重施”呢？通过田野问询，我们将菜农的回应归纳为以下几点：无力担负蔬菜病虫害带来的减产风险、科学信息不对称和双重道德标准、农资市场混乱和政府监管不力。

农业现代化的步伐过快，使农民的“调适性智慧”没有用武之地。在访谈的过程中，菜农也向我们讲述了一些为了省钱而不用农药防治虫害的土法，如：在蔬菜的旁边套种上一点辣椒来达到驱虫的效果。这种利用生物链之间相互制约特点的方法已在新兴起的“生态农业”实践得到运用。比如说，在蔬菜周围种上一圈香草，可以利用其气味赶走虫子。同时农民还说可以用草木灰撒到地里。有的靠皮肤呼吸的虫子会分泌一些粘液，一旦沾上草木灰，就会窒息而死。草木灰还可作肥料之用。这种农民先前在种地过程中生产出的实践性知识，在要求快速见效的现代化农业进程中被淘汰殆尽。另外，日新月异的农业农药技术更加衬托出农民“调适性智慧”的低效和“低能。”久而久之农民失去了自主动力，完全依赖农药和化肥来解决问题。

农业产业化导致村内分离出了很多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例如：蔬菜中介商、农资供销商、蔬菜运输司机等等。这些“非农”人员发现：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商业活动比直接从事农业更赚钱。所以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从土地转移到做生意上来；同时多数农民没有足够精力腾出粮田搞蔬菜大棚，所以只剩下一小块地种植粮食，但又无暇细心耕作；同时村内很多年轻人都不愿种地，更愿意到市里找个轻松

---

<sup>3</sup> 黑药，治疗根线虫的剧毒农药，里面含有大量的汞，由于近年来市场上禁止销售，只能在黑市买到，故名“黑药”。如果年轻人经常食用使用过黑药的蔬菜，会造成不孕不育。

的活干干。村内开始出现了大量种着粮食作物，但缺乏照料的田地。

2005 年左右，第一家外企“利百育苗场”入驻平安村。“利百”是知名的国际种子子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外商或大型承包商来选地时，一般只租种大面积的没有种过蔬菜大棚的粮田。因为他们知道，蔬菜大棚用地已经被污染了，继续种植蔬菜的，在防治各种病虫害上投入的成本会更大。他们之所以对土地的要求比较严格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不是直接出售种子或蔬菜，而是以通过出售种苗的方式出售种子。种植种苗需要没有污染的环境。在选好土地后，他们一般先跟乡政府协商，然后乡政府再通过村里干部跟村民协商。租售的价格是以亩产 1000 斤小麦为标准，具体价格参照当年小麦的市场价格。这样一来农民就可以在收取租金的同时，专心从事自己的劳动。据保守估计，目前村内剩余土地中有三分之二已经被流转。

从表面上来看，当地农民似乎是土地流转的受益者。但是如果我们深挖一下就会发现其实不然。现在菜农的大棚用地经过 20 年耕种，土壤因使用大量农药和化肥，已经被污染。要想种出蔬菜必然要加大药肥的使用力度。而现今石油价格的上涨也使得农药和化肥的价格节节攀升。农民的投入与日俱增。目前很多菜农在大棚种植的过程中被迫多次更换土地。因为土壤被污染以后，种植蔬菜的产量会明显下降，用再多的化肥也无济于事；同时由于蔬菜安全问题，消费者对于蔬菜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种植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和有机蔬菜成为时尚之选。而限制使用农药和化肥，使农民种出符合消费者要求的蔬菜的难度大大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休地、养地势在必行。然而，原来可以派上用场的村内相对闲置的土地，现已被外来的大额资本租用。可以预见，现在种植蔬菜的菜农在不远的将来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在卷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之后，平安村已经成为了国外种子公司的试验基地和推广市场之一。平安村菜农种植蔬菜的种子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外商在不同蔬菜领域内攻城掠地，竞争激烈。世界种子巨头瑞士先正达、荷兰瑞克斯旺、德瑞特，美国孟山都和以色列海泽拉等国外种子子公司，都先后以其种子优秀的“商品性”和研产销相结合的商业模式打败了当地的土种子。国内的种子品牌在种子的市场上没有独立的一席之地。种子市场被国际势力最终垄断之后，农民不得不接受越来越高昂的种子价格。



图 2：平安村内的利百种苗场中的工人们在育苗。

目前村内最大的种子育苗基地“利百育苗场”属于一家荷兰种子公司。育苗场场长向我们介绍了‘利百’种子的推广过程：“首先从荷兰总公司引入新品种，在市内试管站试验。然后将选出的好品种推荐给村里菜农。一般是先免费给菜农 50 棵种苗。然后试管站会向菜农咨询，了解哪一个品种比较符合要求，再加以推广。”新品种能否被当地菜农接受，取决于下列因素：产量高、抗病毒、果实的硬度（抗运输、易保存）、个头（大小适中，比较均匀）、颜色（顾客比较愿意买的颜色）。”由于种子公司直接与菜农交流，所以很容易获得关键信息，也能够及时反馈给研发部门，以生产符合要求的种子。在推广过程中，种子公司并非直接出售种子，以出售种苗的方式卖种子，以保证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并保护种子知识产权。这些种子在种植前就受过类似“绝育”技术处理，一次种植结一次果。如果菜农种完一代后自己留种，是不可能结果的。农民只得继续购买。种子公司只出售种苗也避免了种子被拿去研究的情况。

农民购买种子只看“效果”不看“国别”。现在的土地用普通的或者稍微“落后”一点的种子种出来的蔬菜很容易生病，连农药都治不了。农户只能不断跟着种子公司的步伐进行更新换代，使用抵抗新病毒的种子和新型农药。虽然“洋种子”的价格是本土种子的 10-20 倍。然而没有农民为了省种子的钱来冒减产的风险。目前，平安村内 80%以上的种子都是价格昂贵的洋种子。一颗七彩椒苗要 1.1 元，一个大棚种苗的投入为 2000 多元。如果按照种子的重量计算，一克价格为 160 元左右。“一克种子一克金”的说法毫不过分。据我们观察，整个寿光种子市场的多数品种，如



小西红柿、茄子、五彩椒、无刺小黄瓜都已经完全被洋势力垄断。种子推销商小刘告诉我们，“洋种子要想进驻中国市场会先入驻寿光，因为整个农村地区只有寿光的农民才舍得花钱。”面对种子市场被外商控制的局面，寿光市政府在 2011 年的蔬菜博览会上推出了“爱国牌”种子，希望能够以此收复失地。到目前为止，这一做法尚未奏效。



图 3：寿光蔬菜博览会园区大棚内来自世界各地的西红柿品种，每一个品种都具有比较好的商品性：抗病毒、果形均匀、抗挤压。

在蔬菜大棚实现规模化种植以前，平安村村民间相互“帮忙”是件再也普遍不过的事。据村民回忆：以前没有钱，也没有地方雇人，如果遇到需要人手的时候，都是互相“帮忙。”比如说，割麦子、掰玉米、割韭菜，以及种大棚盖棚和摘西红柿这些事，都是靠轮流“帮忙”做完的。而今村内帮忙已经完全被外来雇工所取代。村里最早的雇工使用始于购置联合收割机的 1995 年。当时村里没有人愿意尝试。因为用联合收割机需要花钱，而且大家都怀疑收割机会压坏田地。在大队里的党员和村干部率先使用后，几户经济条件好的农户才开始接受收割机。随着蔬菜大棚的种植普及和经济收入的增加，多数人忙于种棚而无暇管理粮田，联合收割机的使用更为普遍。亲戚朋友帮忙割小麦和打场<sup>4</sup>的情景已经不复存在。

到 90 年代末，机械化的进展使粮田帮忙的需求骤降。同时村民们在种植蔬菜过程中开始互相帮忙。比如：当时盖一个大棚需要四五个人干半个月。访谈对象春英

<sup>4</sup> 打场：给小麦脱粒。

告诉作者，“1989年的时候，建的第一个大棚，大概有四五十米长，花费1000元左右，其中1/5的钱是花在了帮工的饭钱上，因为当时没有雇工，也没有钱雇工。周围多数人都种棚。一般是四五户人家合作，互相帮忙。大棚建成以后，种植蔬菜也是互相帮忙，把种植的时间错开几天，等到收割和采摘的时候也可以先帮一家弄好，再帮另一家。以前晚上也经常会到人家家里帮忙捆芹菜、捆韭菜。大家一边聊天一起干活。小孩们在一旁玩，或者听大人聊天”。而随着蔬菜大棚形成规模后，每户人家种植规模扩大了5到10倍，再也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互相帮忙了。这时村头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市场“劳雇市场。”村民如果需要劳动力，可以去领一个人回来。最初雇工价是一天30元，现在一个壮年男劳力要开价200元一天。与此同时，村里育苗场、收购中介商（本村人）的出现，菜农的很多劳动，如育苗、择菜、清洗、捆绑、装箱都渐渐地分离出来，给外来务工人员创造了工作机会。菜农只需专心种菜。

目前，传统的村内关系被商品关系所侵蚀。以前村内关系充满着温情脉脉的色彩，互助、帮工、伴工是主要的特点。现在，相当一部分的村内关系都商品化了，请人帮忙或帮人干活均用现金支付工资，通常都当场付清，就像做买卖一样。（张乐天，2005）劳雇市场将帮忙转化为明码标价的劳动力交换买卖。村民们都熟知劳雇市场的劳力价格，谁也不好意思去找人帮忙。大棚里的活少的时候，村民会跑到村头的劳雇市场做劳工赚工资，而不是去邻家帮忙。现在村民的“帮忙”主要局限在红白喜事方面，少有涉及经济活动。即便是村里的中介商需要找村里的老人或没事做的人干活，也得按天或件数支付工资。

大棚产业化对于日常乡村生活景观最直接的改变有两个方面：首先是猪栏的消失和垃圾桶的出现。致富之前平安村内猪栏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养猪，还兼具消化生活垃圾的功用。以前盖房子的时候，都会考虑在院子里盖上一个猪栏。即便没有养猪的打算，也要盖上一个猪栏。猪栏在盖房时的重要性不亚于垒锅台<sup>5</sup>（灶台）。如今普通人家已经很少有猪栏了。因为在多数人看来，猪栏比较脏，夏天容易生蛆和招苍蝇，所以猪栏基本上都被掩埋处理了。现在的垃圾多被垃圾车拉走掩埋处理。

在大棚发展之前，村内垃圾基本上都是生活垃圾，与如今充满无法降解的塑料制品的垃圾有着天壤之别。过去生活垃圾一般都会倒在猪栏粪坑内任其腐烂。同时在猪栏里养一两头猪，剩饭剩菜都可以当饲料。不能吃的就倒入猪栏的粪坑。这样，

---

<sup>5</sup> 锅台是指做饭的灶台。

生活垃圾跟猪粪和人粪堆积在一起沤成肥，等到翻地需要肥料的时候，就会往粪坑里再加几小土，混合一下，以防止粪肥发酵放出的热量烧坏麦苗给烧了，还能节约粪肥。在过去粪肥是个宝。村民把粪肥拉到地里晾干以后，匀开后翻到土下。等后来出现了旋耕机，可以直接打碎粪肥，施到土里。这样来年的庄稼会长得很好。如果不种地，也可以把粪便卖掉或者做个人情送给需要的乡里乡亲。在年底时买卖粪肥也曾是村民重要的现金来源。

随着市场化的加剧，人们的经济条件不断改善，只有过年才能杀猪吃上肉的情况已经一去不返。在村里超市上很容易买到猪肉。蔬菜大棚的发展也使得村民的现金不再短缺。而养猪远没有种菜赚钱来的方便快捷，还被当成招蛆惹蝇的脏活。猪栏的存在也就没有必要。同时，蔬菜大棚种植倡导规模化发展。在种植过程中多使用化肥以及从市场购买的有机肥。菜农对作者说，“使用粪肥确实比较养地，但是非常麻烦，同样的一个 70 米的大棚施肥，用粪肥需要两个人两三天的时间，而用化肥只要一个人在浇地的时候，把化肥洒在水里，两三个小时就行了。这样可以省下更多的时间种大棚蔬菜”。

放置垃圾的猪栏消失后，村民把垃圾倒在村子后的小树林里。垃圾越来越多，难以处理的塑料袋也充斥其间，随风飞舞。村里的找食的狗也会把垃圾弄得到处都是。这常常导致住在小树林附近的两户人家与倒垃圾的人发生口角和冲突。后来，小树林被垃圾围的差不多了，人们开始把垃圾倒在村后或村头河边。如今，夏天一旦下大雨，由于通往河里的简陋下水道<sup>6</sup>被垃圾堵住，村里已经无处排水。

村内有的人家盖起楼房，所以为了方便开始用马桶。村里没有可供排放的专门污水池，只能在自家楼下挖一个将近 4 立方米的池子。刚开始使用起来还算方便。但在使用了 6、7 年后，池内粪便漫溢出来，没有菜农愿意接受并运到田里。最后只能雇人处理掉。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将近 10 年。今年村里终于有了公共垃圾桶。每天早上都会有专车来把垃圾收走，运到距离本村近 10 里的垃圾场掩埋。而那个垃圾场附近的村庄成了有名的癌症村。近两年刚刚被全体迁走，一个村庄就这样消失了。

在过去平安村的猪栏是村民生产生活的一个重要环节，能满足其诸多需求。首先，人在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垃圾的集中堆放于猪栏，使得生活场所不被污染，也确

---

<sup>6</sup> 村里的下水道就是在中心街两边挖的半米深的沟，然后在上面搭上一排水泥板。

保了村内的自然环境的整洁。另外，垃圾在猪栏的粪坑里发酵后产生的肥料可以当有机肥使用，同时也减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也相应减少了对村内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程度。

随着村民经济条件的改善，自家养猪的需求降低。蔬菜大棚种植对于中高产量的要求，使农药和化肥迅速替代了猪栏内产生的粪肥。被人们觉得很“脏”的猪栏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随着猪栏的消失，家庭的生活垃圾无处堆放，开始污染了周边环境，村民之间矛盾频发。现在对生活垃圾所做的集中掩埋处理，即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另外，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已经污染了土壤、空气和水分的污染。蔬菜大棚离开了农药、化肥，很难防治虫害并种出高产量的蔬菜。这直接地导致了村内生态环境恶化，不可避免地产生蔬菜安全问题。

到目前为止，从事蔬菜大棚种植的农户经济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存款。然而我们通过田野观察发现，菜农辛苦劳作付出的是身体健康每况愈下的代价。在当地就有“寿光人上半辈子赚钱，下半辈子花钱”这样的说法。45岁左右的菜农（也就是90年代初一直种大棚到现在的人），基本上都有一身的毛病：腰疼、腿疼、关节炎、哮喘病。据数据显示，整个寿光的农民的职业损伤率高达79.1%。这些身体问题的产生跟大棚内高温高湿的环境、高强度的劳作、农药的使用密切相关。如今即便是50多岁的人仍然在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他们偶尔会对着作者抱怨种大棚很累很苦，却从未考虑什么时候停下来，还显出靠劳动赚钱的满足感。

在田野调查时，作者曾尝试与菜农们一起弯腰或蹲着进入大棚。为了保持室内温度，大棚的六周基本都是封闭，只留一个能够允许爬入的洞口。在零下十几度的冬天，菜农入棚后得脱下厚棉衣，因为棚内温度一般保持在30度左右。干活时即便只穿线衣还会汗流浹背。出于规模化生产的管理需要，大棚采用单一种植的模式。由于菜农很舍得在化肥以及蔬菜品种改良投入资金，因而蔬菜棵的密度再大，都不会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但蔬菜密度的增大，使得菜农劳作空间明显缩小。两排植物之间的狭小空隙只能容许一人纵身进入。在给西红柿整枝打杈、点花授粉时，菜农都需要长期保持弯腰、蹲着、低头这样的姿势。为了保证速度，菜农还得尽量避免在中间伸腰、站立这样的动作。这样的劳作习惯使得很多菜民腿骨变形、O型腿、腰椎间盘突出。此外，菜农劳作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就是打农药，一般都是人工完成。衣着单薄的菜农背着喷雾器，边走边打。在没有配备口罩等基本防护设施的条件下，菜农不可避免地吸入大量的农药喷雾。菜农在打完农药后就会出现呼吸困难、恶心

呕吐、皮肤红痒等状况。在冬天，大棚的室外与室内的温差可达 40 度。菜农劳作结束后，身着汗水湿透的衣服走出大棚，面对的是凛冽寒风。长此以往，菜农都患上了关节炎类的疾病。

包括寿光电视台在内的各类当地媒体的药品广告，大多都以大棚菜农为潜在对象，其中有一大半是关于治疗关节炎、风湿病、类风湿病、腰椎间盘突出，连宣传药物疗效的也是当地的菜农。他们无奈地说，“在腰疼胳膊疼的情况下，很少去医院看，一般都是‘熬着’‘靠着’。除非疼得不能干活了，才会考虑去医院。平时贴贴膏药就行了。因为看病贵。虽然现在实行新合作医疗，在村里诊所可以报销医疗费。但是村里没法治在大棚内害的这种毛病。去大医院报销的又很少。再说这都是老毛病了，不可能根治，所以拖一天算拖一天。”



图 4：平安村最早种植大棚的农民之一，目前已经种植大棚 20 多年，因为长年在棚内劳作，患有风湿病，同时膝盖骨磨损。

伴随着寿光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是与日俱增的城市化速度。2010 年，寿光市政府规定农民不能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新房，只能购买村内集体盖的单元楼，购楼后原来的宅基地就被收回。按照村里习俗，儿子结婚前，父母一般都会向大队申请一块宅基地，给孩子盖新房，娶媳妇，而自己一般住原来的老房子。而如今，要想在保留原有房屋的同时再给孩子安置婚房的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寿光市里买房子。如果孩子还小，老房需要新盖的话，则可考虑在村里买单元房，等孩子长大了再作打算。

我们发现村内适婚年龄的年轻人普遍依靠父母在寿光市内购置房产。平安村内

从事种植蔬菜大棚的人员最年轻的是 36 岁。因为谁都知道，玩棚是苦活、脏话和累活，到老还会落下一身病。不但年轻人基本上不愿意留在村里继续干农活，父母也不希望孩子继续自己种棚的苦差事。目前，村里年轻人都倾向于去寿光市里找工作。男性会去县城的钢厂车间干活。女性多会去物流园给来自全国各地的蔬菜收购商装套菜<sup>7</sup>，做临时工。他们有的早出晚归，有则直接在城里租房住。

考虑到年轻人工作需要和现在的盖房政策，在城里购房对村里人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城里的房价要比村里单元房贵得多。村里的单元楼大概每平米 1100-1800 元。开发商还会按照原来的房子给予一定补贴。菜农只需自己补上 4-5 万元就可以拿到一套面积为 120 平方米的房子，所承受的负担不算大。而寿光城里房价平均在 3000 元左右，在没有任何补贴的情况下，购买一套 120 平方米的房子，价格在 36 万左右。这对村里菜农来说，意味着要动用所有的积蓄，甚至还得贷款。笔者到村里回访时发现，房子已经成为第一话题。不少菜农勒紧腰带也要争取给儿子在城里买上一个房子，哪怕是一个二手房。而婚事告吹的主要原因也就是无法满足必须去城里买房的女方要求。

村里年轻一代入住新房，开始在城里生活后，回平安村的时间越来越少。村内的青壮劳力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发生了转移，目前种植蔬菜大棚的最年轻的平安村人是 36 岁。村内种植蔬菜大棚的平安村人也越来越少。在人力外流和菜农老龄化的情况下，平安村的蔬菜大棚的未来充满了变数。年轻人用上一代人的积蓄在寿光城内购房置屋。大棚种植业将无后人承继。在未来的 10 年到 20 年间，平安村传统的实际居住地间保持“一碗汤的距离”的养老方式也将不复存在。

目前老人和孩子虽然不在同一屋檐下，但离得也不远。孩子经常会做出好吃的给父母送去，这个过程中会受到同村人的监督，如果经常给父母送好吃的，则会受到大家的赞扬，否则会被说很多“闲言碎语”。而“一碗汤距离”的消失，既使得年轻人照顾父母变成了一件比较麻烦的事，同时也打破了“闲言碎语”这种舆论的压力约束年轻人遵循传统道德的作用。

综上所述，“寿光模式”在发展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让农民普遍致富的同时，也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市场化和产业化力量的驱使之下，农民不能够自己把握前行的方向，生产种植越来越多的依赖于现代化产品，其原本具有的主动的调适

---

<sup>7</sup> 套菜，把不同种类的蔬菜，整理后放在一个箱子里，配成一套。

性智慧处于边缘的位置。农村生态环境退化，人际关系被商业化所侵蚀，农民在种植的过程中开始不断失去自主性，身体也越来越差，同时年轻劳动力和智力流出，养老方式也被打破。取得阶段性成功的寿光模式似乎已经到了回顾和反思的时候了。

#### 四、结语与讨论

通过对平安村致富历程的审视，我们认识到：“寿光模式”到目前为止能让农民受益致富的关键，就是充分利用了农民的调适性智慧（adaptive wisdom）。我们不妨将所谓的“调适性智慧”视作斯科特提出的人类学表述：“美蒂斯”（metis）”。即一种只能从实践中获得的知识。在本论文的语境中，调适性智慧主要是指菜农在生产实践中利用总结出的应对策略。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政府忽视了农民的调适性智慧，实行的“自上而下”的经济作物的推广项目基本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当农民充分利用自己的实践知识，改进“冬暖式大棚”，种出反季节蔬菜时，这一地方性技术迅速推广，同时农民在种植中相互交流种植的经验和心得，农民开始致富。这也是寿光的“绿色革命”与上个世纪 50 年代之后由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第三世界国家发起的绿色革命的歧异之处。应该说，寿光绿色革命在一定程度上让农民普遍致富，受益的不仅仅是农资商、农用机械设备制造商、蔬菜营销商、以及农业专家。

但是随着政府在农民调适性智慧基础上建构的农业现代化的“寿光模式”的推广，则未必会产生良性效果。这是因为农民在分得绿色革命的一杯羹的同时，其所处的经济生活、社会关系、生态环境、身体都开始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为发展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从表面上看，农业现代化的进展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寿光的农民一直在不断赞叹其成果的神奇，即便科技种子到了“一克种子一克金”的价位，他们仍然在称赞其高品质的商品性，种子的民族性问题只是公共知识分子需要考虑的问题。可以说实现蔬菜产业化后的农民只有在自己的身体感受到疼痛的时候才会思考一下原因，但考虑到相对于过去的富裕觉得这种身体的透支是值得的，当劳动变成了维持生计的手段，对于财富惟命是从时，农民已经被异化（alienation）（马克思，恩格斯，2005），导致了他（她）看待其种植作物的态度和情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同时，他们在生产过程中不需要过多地思考问题的解决方法，因为他们坚信，科学都可以解决。毫不客气地说，“潘多拉盒子”里的“发展代价”更多的是农业的

现代化对农民调适性智慧的排斥性挤压所造成的。

首先，“寿光模式”促发我们思考并质疑的是对于农业现代化中为盲目追求速度、效益而不计后果的发展模式。政府所追寻的农业现代化的普世模型，没能给其他文化选择（如：调适性智慧）任何空间。于是内聚了生活方式、制度化和文化的整体的地方性模型，被“发展”或“现代化”之名的挖掘机、卷帘机、农药、化肥、科技种子、楼房所摧毁。而一旦这种一元化的农业现代化出现问题，整个社会都会处于风险中，很难找到替代方式。官方话语下的“寿光模式”是在由调适性智慧产生的农村蔬菜产业化的基础上结合农业现代化重构了的“寿光模式”——农业产业化、生产标准化、市场国际化、土地农场化、农民工人化。在寿光蔬菜业开始发展的时候，政府就开始不断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招商引资，进行土地流转，让国外的农资企业直接入驻农村，用补贴的方式鼓励农民使用机械化种植。目前，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农业现代化的速度越来越快，现在的平安村也开始处于急剧的社会结构的转型中，不仅蔬菜生产现代化，农民的生活、住房也都在“被现代化”。

从蔬菜业开始发展，政府就一直用“农业现代化”、“科技兴农”等发展话语，让农民相信只有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农民也信以为真，将其视为代表了真理的真实世界，在生产中用发展专家们认为更优种子、化肥和技术代替村落文化中的“土种子”、农家肥和耕作技术。与很多发展人类学家的发现不同的是，由自给自足的直接获取食物变成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成果间接获得食物(Sen, 1983)的农民为了增加蔬菜产量，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积极地接受农资商向他们推销的科技种子、化肥、农药和机械化耕作。

因为种植蔬菜是农民自己找出的一条致富之路，所以对于种植蔬菜是很有积极性的。在农业商品化的背景下和在土地面积一定的情况下，农民要想获得更多的收入，必须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这就意味着农民应该根据环境充分利用调适性智慧调适出更好的耕作方式。而农业生产中的小农模型是源于“地育万物，量力而出”，人类必须通过劳动“帮助”土地孕育物产。人类与土地之间存在着一种施与受的关系，这种关系被塑造成了互利互惠。(Arturo Escobar, 1995)。而农业现代化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小农模型，现代化的技术与农民的调适性智慧的相遇，农民很快就直接选用了高产的科技种子、农药、化肥和机械化，来最大限度的开发土地，失去了对利用调适性智慧的积极性。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尽管调适性智慧具有很强的植根性和灵活性，但是它的产生也是具有社会条件的，主要需要有感兴趣的社区、积累的信息和持续的试验。而科技种子、农药、化肥和机械化等现代化产品的进入，使得原来农民自己留种、用“土法”杀虫、用农家肥滋养土地的实践知识看起来是低效的，农民会很快地使用相对高效的现代化产品，这就使得某些调适性智慧显得有点多余，如此以来，农民便失去了绞尽脑汁在实践中不断寻找让作物提高产量的兴趣，之前的耕作知识的口口相传也不再有意义，调适性智慧在农业生产中开始处于边缘化的境地。

现代化产品的出现渐渐地使得种植的知识趋于一元化、普世化，一旦产生问题很难找到可行的替代性方案。现在农民种植作物必须采用一个“技术包”（良种、除草剂、虫害化学控制），集中专门种植某些作物品种（通常在一个亚区域不超过三种，一般为一种或两种），遵循严格的田间安排规则，遵循预定的耕作程序，准备详细的生产计划，定期进行记录并组织农产品销售（Arturo Escobar,1995）；而调适性智慧不同，它从来不要求普遍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是多元主义的。不同的地区，种植不同的作物都有不同的方法，农民长期的实践中会产生各种不确定性的问题，随着对这些随机问题的解决，农民的知识体系会不断地完善。一旦产生问题，在一个方案无效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交流采取另一种方案。

纵观“寿光模式”由农民的调适性智慧为主导到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它并没有脱离西方话语和西方思想的权利支配，因为它践行的就是西方话语支配下的发展主义道路。这种农业现代化实际上就是现代化的普世模型，而不留给其他选择（如：调适性智慧）任何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经济化，包括农村生活、自然生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Arturo Escobar,1995）目前，为了保证 GDP 以及农民的收入数字增长，在蔬菜生产的过程中，需要更高的农业产量，这就需要新的作物、改良技术、机器和更好的市场，马上政府就会开始新一轮的农业现代化计划。虽然现在的农民的存款在增加，给孩子购房、购车，但是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农民的病体、日益失去的自主权、商品化的社会关系、青年劳力和智力的外流如何能保证村庄的未来和农民刚获得的富裕标准呢？

一旦谈到村庄未来，菜农们便给我呈现出一幅现代化的“美国式农场”的画面：

当问及“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种大棚了，以后你们也种不动了，我们村的大棚谁来种呢？”时，村民觉得我是杞人忧天，很清楚地回答道“这个不难解决，现在已经有人到村里来租一大块地，然后建一个大型农场，里面都是现代化的设施，一切都是机械化，蔬菜种子都是高科技的，产量更高，一个人就可以管理两三个大棚。要是我们愿意也可以去给他们干活，领工资，不用像自己种地那么操心了。”

通过这一简短的对话我们就可以看出，农业现代化的宣传是非常成功的，就连普通的农民也已经给村庄的未来构建出了一个“美国农场式”的图景。但这一农场的图景很难让人看到村庄的未来，因为其中并没有农民的位置，更多的是企业、资本的位置，这只是一个农业工厂，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村庄。

通过反思发展的代价，我们认识到：农民自己对于处理意外事件和非正式过程中产生的调适性智慧，应该在地方性的生产实践有足够用武之地。或许我们可以借鉴《遭遇发展》中提到的拉丁美洲的“混杂文化”的说法，将调适性智慧视为一种“传统尚未远离，现代尚未确立”的方式（Arturo Escobar,1995）。这种混杂并非单纯的组合，“它需要一定的自由度来修改、占用以及重新占用，而非落入俗套，沦为模仿”，（Trinh,1991:159,161）就像王乐义改进的“冬暖式大棚”。这种“混杂文化”产生在学术界无法找到（无论是批判性的还是传统的学术界），也不可能某些机构（如世界银行、发改委）的办公室里找到，而只能在对大众实践的重新解读，以及大众行动者重新夺回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生产空间的重新解读中找到。

寿光的田野案例敦促我们：在 21 世纪的今天，人类学家的首要任务，再也不是像 19 世纪的社会进化论前辈那样，以拍脑袋和想当然的方式，来盲目绘制人类社会的发展蓝图。人类学家应该做的和能够做的，是不断地提醒人们对自己的选择和决定负责，慎重地对待任何可能影响人类未来生存条件的经济发展项目。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再是期待政府推出的一个个农业现代化模式，而是期待一批“王乐义”的出现。

#### 参考文献：

- [1]Yan, Yunxiang, *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9*[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见中中译本：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 [2]Scott, James C.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见中译本：弱者的武器[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7.
-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见中译本：国家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3]Bodley, J. H. *Anthropology and Contemporary Human Problems*, 3rd ed. Mountain View, CA: Mayfield. 1991. 见中译本：发展的受害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Victims of Progress*, 4th ed. [M] Mountain View, CA: Mayfield. 1999. 见中译本：人类学与当今人类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4]Dewalt, Bille R., Martha W. Rees, and Arthur D. Murphy. *End of Agrarian Reform in Mexico: Past Lessons Future Prospects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Mexico)* [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 [5]Mills, C. Wright.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59. 见中译本：社会学的想象力[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
- [6]Amartya Sen. *Poverty and Famine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1983. 见中译本：贫困与饥荒[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4
- [7]Escobar, Arturo.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见中中译本：遭遇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 [8]Trinh T.Minh-ha. *When the Moon Waxes Red*[M].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 [9]潘天舒. 发展人类学概论 [M] .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2009.
- [10]张乐天. 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8.
- [11][美]蕾切尔·卡森. 寂静的春天[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 [12]赫德英. 绿色革命：王乐义的大棚世界[M]. 济南: 山东出版集团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6.

---

## 农业“绿色革命”得失散议<sup>8</sup>

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潘天舒

### 综述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农业科技专家们为实现解决全世界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采用基因变异技术开发了小麦、稻米和玉米等高产新品种。这些精心研发而成的新品种经过众多国际组织的不遗余力的宣传，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得到大范围的推广。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最大程度地提高每一亩良田的产量，使地球上所有的人过上温饱的日子，成为所谓农业绿色革命的崇高理想。在充满乐观情绪的科技工作者眼中，凭借人类的创造力和理性决策，就应该能够取得农业产量剧增的成就。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绿色革命的目标如能实现，那么新马尔萨斯论者将不得不偃旗息鼓。也就是说，任何有关在有关食物资源与人口增长速度之间相关性的假说，将成为杞人忧天的预言。在进行绿色革命农业实践的多数地区，高产的杂交品种和机械化耕种技术，的确使谷物产量明显增加。然而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饥饱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显然要消除饥荒和贫困，并非靠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就能一蹴而就的。

就持续时间和影响程度而言，绿色革命也许是迄今为止由国际开发组织、政府、科技和产业界合力介入第三世界农业生产过程最为彻底、最富争议的一次发展的实验。本文借助来自人类学田野实践的视角，对绿色革命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文化和社会层面的问题进行审视和思考。这场始于 20 世纪中期以“科学种田”为名义而推出的农业变革，其宗旨是传授有关高产作物品种、化肥和农药和各类农业机械设备的知识和技术，实现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欠发达地区）消除饥荒和贫困的终极目标。在进行绿色革命农业实践的多数地区，高产的杂交品种和机械化耕种技术，的确使谷物产量明显增加。与此同时，全球各地的饥饱问题，却依然存在。显然要消除饥荒和贫困，并非靠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就能一蹴而就的。

本文试图在发展人类学的视角里，通过检视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来加入有关农业绿色革命实践得失的讨论。同那种片面强调投入和收益的市场学观点不同的是，人类学家在衡量农业绿色革命的成败时，首先关注的不是产量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而是要明确谁是农业技术的推广、普及和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真正的受益者，

---

<sup>8</sup> 本文节选自《发展人类学概论》第九章，文字有所增删。

---

以及绿色革命对于当地生态环境的长远影响。只有以关注普通民众的利益为出发点，才能使我们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对那场对世界范围农业发展内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粮食生产技术的巨大变革，进行冷静的反思和总结。

### 农业发展的“希望之歌”？

发展人类学家里夫（Leaf）在印度北部旁遮普邦一个叫“沙希德普”的锡克族村庄的田野研究表明，农业绿色革命在实践中如果方向对头，与当地实际条件相吻合，便能取得成功。里夫在 1964 到 1966 年间完成第一阶段研究，然而在 1978 年进行田野回访。这一时间跨度使得里夫有机会观察到新技术在当地推广和使用的实际情形，并将研究发现写入《希望之歌：绿色革命在旁遮普乡村》一书（Leaf 1984）。从 1965 到 1978 年，同旁遮普邦的多数地方一样，沙希德普村经历了绿色革命从开始实施到结束的全过程。同时该村庄的农业生产也实现了从自给自足的小农模式向机械化耕作的转型。为了增产的共同目标，村民们在实践中尝试使用小麦新品种、拖拉机、杀虫剂和灌溉技术。殷实富裕的农场主们很快就接受先进的农业技术，并且乐意将资金投向农田建设和设施完善等方面。而贫困村民们也在政府发展机构的扶持下，也开始愿意承担资金投入后可能发生的风险。

现代化理论倡导者罗斯托等人曾认为，由于受传统文化模式约束，农民在经济活动中缺乏金融投资的知识 and 经验，因而缺乏采取资本积累等理性策略的能力（参见。而里夫的研究表明那其实是一种充满谬误的假设。因为当农民们看到他们的资金投入能有直接回报时，仍然愿意担当由此带来的相应风险。更重要的是，沙希德普村的村民们为了确保农业生产管理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开始努力地学习和接受有关知识和技能。以业余大学中心为试验平台，一些新的作物品种和种植技术得到了及时的推广和普及。通过中心村民们能知晓他们农业试验的结果。由于政府的学费补贴政策，即便是贫农也能够承担在中心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的费用。此外，针对村民的实际需求，中心还提供了有关农业设备维修的专业培训服务。

在里夫看来，农业绿色革命在这一地区的成功关键，主要在于政府官员是真心实意搞发展，而不像印度其他地方的某些官僚那样，整天盘算着如何以经济发展作为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的主要手段。政府提供的建议和来自村民的反馈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度。同时邦一级和地区一级行政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渠道，也始终保持

---

畅通。对于那些力图在第三世界农村继续开展绿色革命的实践者来说，里夫的田野研究是宝贵的经验之谈。然而，要进一步科学公正地衡量绿色革命的成功程度，分析和讨论其实施过程中的问题，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来自乡村基层的第一手材料。

### 农业绿色革命与乡村贫富差异

必须指出的是，在发展人类学者当中，里夫的研究所代表的，是一种对农业绿色革命大唱“希望之歌”（一如其书名所示）的少数派观点。而大多数有关绿色革命社会效应的案例分析，都毫不留情地指出：在印度等南亚地区实施的农业绿色革命，事实上进一步拉大了农村早已存在的贫富差距（Frankel 1971）。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首先，要参加绿色革命农业实践，村民们必然要投入不菲的资金。同时接受绿色革命科学种田指导的农户，根据要求得购买专家指定的高产杂交品种，从而不得不放弃按传统的良种筛选方法（即在收获谷物中精心选出的供来年耕种的优质稻种）。然后还需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商用肥料。有机肥料的使用传统几乎在眨眼间遭到淘汰。最后农户还必须添置与新技术相配的灌溉来源和设施。无疑只有富裕农户才有足够本钱来尝试新技术和新品种，成为绿色革命的真正受惠者。而寻常农家在播下新的稻种之后，便没有能力继续投入对于他们来说是极其昂贵的资金，其结局基本上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轻则庄稼欠收，重则因无法还清购买新品种的贷款而负债累累，不得不出卖土地，酿成妻离子散和家破人亡的惨剧。与此同时，那些在新的农业技术革命中尝鲜而得以暴富的农业大户乘机在土地市场上攻城略地，大量收购破产农户被迫出卖的土地。这些盈利之后的暴发户于有足够的资金添置拖拉机等其他农用机械设备。而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对于弱小农户来说无疑雪上加霜。由于经济实力的匮乏，他们只能受雇于大户，在农忙时打打短工。多数人则会流向城市，最终成为贫民窟的一员。

人类学家德沃尔特（Dewalt）在绿色革命得到大力推广的墨西哥乡村的田野调查发现，采用农业新技术而实现的作物丰收，不过起到了为家禽和畜牧业增加饲料来源的作用而已（Dewalt 1994）。他的研究表明，墨西哥谷物年产量的半数以上都是用来喂养生猪、肉鸡和肉用牛。也就是买不起肉的穷人并非绿色革命的受益者。由于贫困差距的加大，绿色革命的扩展反而使有能力购买肉食品的消费者人数逐年递减。德沃尔特的结论是农业绿色革命所带来的商品化和产业化趋势只能进一步拉开

---

墨西哥农村原来就存在的贫富差距，而食物、能量和劳动力并未得到充分使用，导致农业发展停滞不前。

另一项来自人类学家弗兰克（Franke）的田野调查（Franke 1977）显示，除了贫富悬殊这一绿色革命在推行中所遇到的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外，还有地方和政治层面的许多不可控的政治因素。这项在印尼爪哇完成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意愿与复杂现实相矛盾的绿色革命案例。与众多人口稠密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样，印尼的爪哇岛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成了农业绿色革命的首选试点区域。在绿色革命期间，包括印尼在内的多数东南亚国家政府，都大张旗鼓地鼓励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经杂交培育而成的高产稻种以及化肥和杀虫剂。然而绿色革命在实践中能否真的实现增产增收的目标呢？

首先，绿色革命在实施过程中所遭遇的第一个难题便是由于荷兰殖民统治而日益加剧的社会等级化现象。以政府官员、商人和大地主为代表的富人群体和小农团体间的差异，在印尼农村都是有目共睹的社会事实。针对这一情况，印尼大学农学院在 1963 年绿色革命刚开始不久，就尝试推行一个将大学生派往乡村基层，与农民同住的项目。在这一印尼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大学生们积极参与田间生产，与农民分享新的农业技术，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视野，学到了很多课堂以外的

经验性知识。由印尼农业部主导的这一试点项目在 1964 年在全面铺开。参与项目的成员包括来自九所大学的四百名学生。颇有意味的是，绿色革命在试点项目地区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甚至可以说是唱响了“希望之歌。”这主要是由于在试点村，大学生们得以随时监督试图渔利的富人群体的一举一动，以各种方式确保普通农民的农资设备不受侵吞的缘故。而在未试点的乡村，绿色革命根本未能惠及基层民众。显然经济发展在实践中无法单纯依赖技术革新这一途径。

在 1965 到 1966 年发生的政变导致苏哈托总统下台。新总统苏哈诺在上任后继续推行鼓励农业增产增收的一系列政策。然而推行绿色革命的主干力量有了变化。与日本、西德和瑞士跨国企业关系密切的特殊利益集团成了主角，原本的大学生和农民被边缘化。跨国企业负责向印尼提供高产稻种、肥料和农药。而参与绿色革命的印尼农民则通过向银行申请获得贷款资格。学生和农民的缺席，使得农业绿色革命失去了来自底层的宝贵动力，很快就遭遇到了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说，一种从未在印尼测试过的杀虫剂，在使用过程中杀死了生活在灌溉渠道内的鱼群，使

---

当地人的饮食选择中从此失去了一个主要的蛋白质来源。由于地方利益集团把持和操纵绿色革命的进程，贫农们的积极性受到了极大挫伤。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类似的是，绿色革命在印尼的实践使农业生产的趋利倾向越加明显，参与者变得相当短视和浮躁。同时农业生产者对机械设备和化学药剂的依赖，也使地方生态环境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

### 农业机械化和企业化的生态效应

在后绿色革命时期，在农业领域发生的商品化和机械化，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已经开始产生令人们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其中最严重的是农业公司和企业成为新的污染源头。作为农业机械化生产的主要力量，农业公司和企业必须依赖化石燃料、化肥、大片的耕地和杀虫剂之类有毒物质，来维持日常运行，并达到增产增收的终极目标。这种由大企业主导和垄断的农业生产模式，正从发达国家推广到第三世界的广大农村地区。在墨西哥、印度和印尼等绿色革命的重点区域，农业机械化生产已经是大势所趋。同时通过基因工程和生物科技等手段，科学家们培育出了更新的小麦和水稻高产品种。然而，为了有效地新品种并从中获利，农民们不得不按照要求使用在灌溉和耕作过程中，不断购买昂贵的资本密集型技术、无法循环使用的燃料（天然气和汽油等）以及含有毒物质的除草剂和杀虫剂。

资本密集型农业的出现，对全球环境产生了大量的负面效应。1984年印度博帕尔某化肥公司发生的毒气泄露事故，就是与绿色革命极为相关的一个导致生态危机的悲惨案例。在那次震惊世界的灾难事故中，有几千名伤亡民众成为无辜的牺牲品。尽管农业机械化所产生的环境变化，未必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突然和恐怖。然而，其潜在的危险性却不容低估。比如说，农产品中杀虫剂和其他相关有毒物质含量的增加，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解决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使在国家明令禁止之后，要将残余的化学物质从食物链中完全彻底地消除，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要有农资企业不断向市场推出各类新型的合成化学产品，生态环境发生危险的可能性就会与日俱增。

此外，在动植物基因工程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尤其是近年来转基因（GM）作物和生物技术在全球各地的传播，引起了环保主义者和人类学家的严重关注。在印度和非洲等地，许多科学家、农业专家和经济学家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



---

莫衷一是，还分成支持者和反对者两大阵营。全球知名的化学公司孟山多公司（Monsanto）是生物技术和基因作物的主要推广者。多年来该公司一直致力鼓吹生物科技的优越性，并企图以此来替代耕犁、除草和留种等传统农业技术。它认为“可持续性”的生物科技可以代替非洲传统的锄头耕耘法。增加作物产量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其主要目标。民间和学界有人对转基因作物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的适用性，一直存有芥蒂和疑惑。而转基因技术的拥趸们却将反对者说成是迷恋博物馆内古董耕作法的因循守旧派。转基因新技术在实践中的广泛采用，助长了被发展人类学家称之为“技能过时”现象（deskilling）。也就是说，小农耕作正在不断地被机器和农业高科技生产模式所代替，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在发达国家，“技能过时”的务农者可以通过政府有关机构得到接受职业培训等机会。而处在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相应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来保障农业“技能过时”者的基本权益。

斯特尔（Stull）和布罗德维（Broadway）两位学者费时 15 年，写出《屠场布鲁斯：北美的肉禽产业》（2003）一书，对美国和加拿大农场企业化和农资产产业化进程及其效应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人类学考察。通过对来自屠场雇员、工会、社区领袖和周边地区居民的一整套定量和定性数据的分析和整理，他们的研究表明，从农场到工厂，随着肉禽企业化已使肉禽产业的高度集中和整合成为大趋势。为了迎合便利速食品的市场需求，促使肉禽业者大量雇佣廉价劳力，丝毫不顾这种疯狂的逐利行为所带来的环保和社会效应。当牛肉、猪肉和鸡肉的集约化生产在北美农业区域大行其道之时，也是空气和水源受到污染之日。当北美顾客在窗明几净的超市选购肉禽食品的时候，他们无法看到肉禽工人面临的恶劣工作条件，也无从知晓肉禽业对环境和社区的负面影响（Stull & Broadway 2003）。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斯特尔和布罗德维对北美肉禽业的研究及其发现，对于食品安全和企业社会责任感这一国际社会瞩目的议题，进行跨地域和跨文化的田野考察，具有丰富的实证和学理意义。2008 年发生在我国的以三鹿毒奶粉事件为标志的一系列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公共危机，完全可以放在发展人类学视域内进行剖析和解读：我们首先看到是以商业化和市场化为特征的“科学育儿”模式（以奶粉或婴儿配方奶为基础），在以技术话语包装的营销策略的帮助下，是如何成功地瓦解了传统的母乳喂养方法；然而，发生在育儿文化领域的这场裂变，在消灭“落后”习惯的同时，是如何为跨国乳业集团和婴儿配方奶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抢占国内乳品行业创造了先机；随之发生的奶源争夺战不过是畜牧业高度企业化和奶场盲目扩张的

---

一个缩影而已；地方政府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无视资本的肆意扩张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对乳品行业的违法不良行为熟视无睹。这一切其实都为三鹿之类企业最终滑向罪恶深渊，起到了某种催化剂的作用。

### 农业绿色革命与弱者武器：斯科特的洞见

在《弱者武器》一书中，兼具政治学者和人类学者身份的斯科特对农业绿色革命在马来西亚乡村社会造成的传统道义经济的崩溃、地主群体和失地失势的弱小农户权力关系的失衡和由此带来的后果进行了细致考察和认真揣摩（Scott 1985）。在斯科特看来，马来西亚从世界体系的边缘进入半边缘这一经济成就，是以农村贫农收入大大落后于其他人群为代价的。他所在村庄在象征绿色革命成果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落成之后，发生了可谓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这一工程得到实惠的无非是已经占有大面积耕地的地主和有能力和支付会员费和行使相关义务的农协成员。如“绿色革命得失谈”一章所述，农业技术引进和升级的最终受益和收益人，多为有资格获得贷款和有偿还能力的境况富裕的农户。物质基础的改变使这一马来西亚小村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穷人和富人间的关系更加难以协调。

在绿色革命之前，马来西亚农村的传统水稻耕种完全依赖手工劳动，是典型的劳力密集性生产模式（包括备垦、水稻移植、收割和脱谷等多道流程）。因而无地贫农和雇农在水田进行的劳动对于地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环节，是秋收的基础。维系地主和农民之间互惠互利关系的是一种被学者称之为“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的形式。农民在实践中发展出的一套旨在规范生产、分配、消费和交换过程以及强调社区合作精神的准则，是道义经济存在的文化基础。一般来说，道义经济的运行使得普通农户通过互享食物和劳力的方式，来得到生活的基本保障。而随着拖拉机和大型收割机的出现，手工劳动顿时失去了用武之地。道义经济也随之瓦解。除了秧苗移植之外，绿色革命几乎淘汰了所有过时的人工耕种技术。而农民在这场经济巨变中失去的，不仅仅是在传统社区中受人敬重的生产者的角色，而且还得忍受一种由于丧尽文化尊严而带来的巨大痛苦。更重要的是，属于农业绿色革命的利益既得者的地主和新富阶层，试图以一套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霸权话语，来说服和“教育”经济发展中的所谓“输家”，使之甘心情愿地接受在社区中的从属地位。

---

村庄中由于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产生的社会矛盾终于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斯科特似乎都能闻得出空气中的火药味道。实际上诸如焚烧收购机和妇女拒绝参加移植劳动之类的事件层出不穷。然而由于法规和政府高压政策的限制，穷富之间的直接冲突并不多见，更多的是以弱势群体通过使用“弱者武器”的形式表达自身的不满和对社会正义的诉求。斯科特将日常生活中弱者武器的独特运用方式作了如下概括：懒散推拉、装腔作势、擅离职守、假装顺从、小偷小摸、装聋作哑、谣言中伤、纵火和蓄意破坏等等（Scott 1985: xvi）。斯科特将弱者赖以表达其抵抗情绪的方式分为“公开的文本”和“隐藏文本”两类。前者可以理解为在强势人物前假意奉承并认同充满和睦、兄弟情谊和传统教义等虚伪词藻的表面说法。后者则是弱者在幕后通过闲言碎语、冷嘲热讽甚至造谣毁誉来泄愤排遣的方式，是化解公开文本中“霸权话语”的“背后一套”说辞（1985: 27）。隐藏文本准确反映了弱势群体对所处境遇的判断和对现状的看法和解释。

斯科特对于“弱者武器”和“隐藏文本”的详细阐述和精密分析，使田野工作者大大加深对日常生活中底层民众并不鲜见的抵抗行为的理解。弱者武器和隐藏文本所昭示的抵抗动作，往往出现于农民揭竿而起的主动挑战和忍气吞声的被动状态之间。这种抵抗缺少周密计划和精心组织，与宏观层面的政治运动也没有关联，不受任何意识形态倾向的影响。它在瞬间发生，随即消逝。对斯科特来说，这种时隐时现的抵抗行动是弱者的一种策略，比单纯以血腥暴动来鸣不平的抗争代价要低得多，却有更为持久的实效性，足以瓦解农业绿色革命基层推行者的信念。

## 总结与思考

从批判家的角度来看，绿色革命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施过程中，并未能满足普通农民的需求。这一现实有违技术革命推广倡导者的初衷。绿色革命的赢家多半是化肥供应商、稻种供应商、农用机械设备制造商和营销商以及收入剧增的农业大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得到巨额研发资助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也是绿色革命和随后发生的农业企业化的赢家。由于牵涉到个人和集团利益，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像发展人类学家一样，以获得的第一手田野材料为依据，正视绿色革命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带来的社会效应。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要对农业绿色革命盖棺定论，恐怕为时过早。但如要总结

---

过去几十年绿色革命的得失，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技术转让是否解决全球范围内饥饿问题的灵丹妙药？本章中对于来自田野实践的众多个案的评述和分析，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作为结语，笔者有必要重申几点发展人类学家已形成的共识。首先，有相当一部分在温带地区开发的农业科技成果，在贫困人口较集中的热带地区的应用效果并不理想。土壤和气候条件的差异造成这一部分绿色革命项目的水土不服现象。其次，有些人类学者怀疑那些所谓高技术含量的农科手段，是否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情况。很多时候，闲置劳力是比资金短缺更现实的问题。再次，与农业新科技相配套的产品和服务，往往是一揽子买卖。如尝试种植某个新的作物品种，就会对灌溉用水和农药化肥等农资产生新的需求。随着基因品种在全球农业地区的广泛使用，农户们已经无法使用传统方法的选种。长此以往，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将受到无法逆转的破坏。此外，包括失地农民在内的绿色革命的输家，在走投无路之际，被迫运用被政治学家斯科特称之为“弱者武器”的各种手段进行抵抗。这些所谓“落后小农”的抵制行为虽然不会改变现状，但也对农业科技的普及起到了阻碍作用。最后，从环境能量的角度来看，先进的农业科技在资源匮乏的地区产生的效益相当有限。通过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生产而达到的高产稳产，是以巨大的能量消耗为代价的。从节能增效和保护生态的意义上来说，使用人力或牲畜耕地的传统生产方式，有相当的合理性。因而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农业绿色革命所推崇的科学种田模式，在实践中是否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背道而驰。

### 参考文献

- [1] Franke, R. 1977. *Miracle Seeds and Shattered Dreams Among the Subanun of Mindanao*. In *Readings in Anthropology*, pp.197-201. Guilford, CT: Dushkin.
- [2] Frankel, Francine R. 1971 *India's Green Revolution: Economic Gains and Political Cos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3] Leaf, Murray J. 1984. *Song of Hope: The Green Revolution in a Punjab Village*.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4] Scott, James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5] Stull, Donald D. and Michael J. Broadway. 2003. *Slaughterhouse Blues: The Meat and Poultry Industry in North America*. Wadsworth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

**※环境 科学 可持续发展※**

## 从“公地悲剧”看自然资源管理

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冯然

### 摘要

“公地悲剧”是一个关于“个人和公共利益之间存在无法消除的矛盾”的寓言，它成为政府就人口、环境等问题进行强有力的管控的理论依据，但同时也暗示着通过完全私有化和开放市场的自由放任政策，可以避免这一悲剧。哈丁的这一理论在应用性上的问题在于它排除了这两种极端政策之外的其他解决办法。通过对特定文化环境的田野案例的回顾和思考，人类学者倾向于认为，资源保护并不需要资源的私有制作为保障，使用者群体或地方社区同样可以作为公共资源管理的主体。

### “公地悲剧”的预设前提与逻辑结果

哈丁在《公地的悲剧》中写道：看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草场，可以预料到的是，每个牧民都将努力利用这个公共福利喂养尽可能多的羊。由于部落战争、侵略、疾病使人和牲畜的数量远远低于土地的承载力，这种局面得以合理地没有冲突地存在了几个世纪。然而，最后，当人们长期期望的社会稳定成为现实的时候，开始清算的日子就到了。在这一点上，公地的内在逻辑无休止地产生了悲剧<sup>1</sup>。这一理论有着三个假定前提：

A、经济人假定。“作为一个理性的存在，每个牧民都在追求其利益的最大化。”出于私利，没有人会认真地保护公共资源，产生所谓的成本“外部性”问题。

B、“公地具有自由使用权”。不付费、自由使用且不受任何限制。

C、“有限的世界”。即人口和牲畜的增长一定会超过土地承载力，“每个人都被锁进一个强迫他无限制地增加自己畜群量的系统——一个有限的世界”。

悲剧有 A 或 B 两个结果：

A、“公地，如果有什么合理性，只有在低人口密度下才存在。”即不存在公地。

B、“公地的自由使用权给所有人带来的只是毁灭”，“陷入公地逻辑的个人自由，

---

<sup>1</sup>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Garrett Hardin. Science, New Series, Vol. 162, No. 3859. (Dec. 13, 1968), pp. 1243-1248.

带来的仅仅是大众的毁灭”。过度投资的结果，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环境上，没有人可以获得长期的利益。然而投资者将设法说服政府部门，不要对公地系统的所有权进行较大改变，由此对资源管理造成了困难。

### “公地悲剧”理论假设的主要缺陷

首先，在哈丁理论假设中的英国公地，究竟是什么样的？如果缺乏对产生“公地悲剧”的历史文化语境的了解，会使得这一理论的采纳者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偏见。1883年首次提出“公地悲剧”概念的洛伊德不忘指出，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是这一悲剧产生的两大条件。哈丁的这一理论可以追溯到西方自启蒙以来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大多数人共同享有的财产将得到最少的保护”<sup>2</sup>。包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马尔萨斯、斯宾塞和摩尔根在内的经济学、人口学和人类学鼻祖，都认定了这种理性人假设。与哈丁理论相似的还有“囚徒困境”理论<sup>3</sup>。然而，一个反例是，美国广袤的草原由于过度牧养，导致载畜力下降，仅200多年的工夫就变成了著名的美国大沙漠。显然土地私有制并没有能起到阻止农场主缺乏理性的经营行为和遏制荒漠化的作用。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人类学田野视角中，公地是一项社会制度。<sup>4</sup>而“公地悲剧”忽视了这一财产制度的社会性，只单纯考察了人与物的关系，用理性人（自私的，无人管治的，追求眼前利益最大化的）假设推导出上述结论。如果将哈丁理论中的公地具体化，很明显，就如同马林诺斯基考察特罗布里恩岛民对独木舟的共产制度时得出的结论：无论公有还是私有财产，都是关于社会责任、权利和礼尚往来的复杂综合体。公有财产的使用权更是人类群体中道德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忽视对具体的社会环境的考察，例如，对公地使用是否有规则，在共同使用中监督和控制他人行为的方

---

2 Aristotle (384 B.C.-322 B.C.), *Politics*, Book II, Chapter III, 1261b; 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 as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ith Introduction, Marginal Analysis, Essays, Notes and Indic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5), Vol. 1 of 2.

3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在其著作《合作的进化》中，探索了经典囚徒困境情景的一个扩展，并把它称作“重复的囚徒困境”（IPD）。在这个博弈中，参与者必须反复地选择他们彼此相关的策略，并且记住他们以前的对抗。阿克塞尔罗德发现，当这些对抗被每个选择不同策略的参与者一再重复了很长时间之后，从利己的角度来判断，最终“贪婪”策略趋向于减少，而比较“利他”策略更多地被采用。他用这个博弈来说明，通过自然选择，一种利他行为的机制可能从最初纯粹的自私机制进化而来。（出自《科学》（*Science*），1981年，第211期：1390-1396页）

4 *The Question of the commons: the culture and ecology of communal resources*. Bonnie J. McCay, James M. Ache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7

法，在公共资源外是否还有其他可利用的资源，等等，很容易假定使用公共财产的人都会发生悲剧，实际上前者是后者的既非充分亦非必要条件。<sup>5</sup>代表社区或氏族利益的地方团体（如部落组织等）通常会对其辖区内的草地和江河湖海的使用权做出限定，方式包括：禁止外人占有自己领地的资源；按照代代相传的路线进行季节性迁徙，并根据不同物候条件随时调整放牧与捕捞形式<sup>6</sup>。简单化地采纳理论依据，很容易制定出错误的政策。

### 对环保行为的辨析

边界对于设定内部的严格规则，即自然资源保护来说是很重要的。世界体系的扩张擦除了地方性的社会政治和生态边界，相比土地所有权本身，这个事件对人类-自然关系形成的挑战要严重得多<sup>7</sup>。

关于环保行为和公有财产是否互斥，人类学者在不同文化中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对于什么是可持续的环保行为，在保护和效率之间，应当采取怎样的平衡，就从来没有一种理论能够清楚界定。Milton(1993)对环保主义做出的定义<sup>8</sup>中，认为区分作为文化的环保主义和人们对环境履行的职责（行动），有助于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Hames 在对亚马逊印第安人的研究中用了最优觅食理论<sup>9</sup>，得出他们并非环保者，而寻求蛋白质摄入的效率最大化。而 Stocks 则区别了三种资源管理的类型，分别为符合最优觅食理论的经济型管理；由“公共财产理论”中国家强制推行的理性社会公约；和有着资源管理效果的习俗。他认为就人们的行为是否环保而言，这些管理类型不能够一概而论。Berkes<sup>10</sup>在对北方克里印第安人的适应性行为进行研究时，指出科学性地理解资源管理，需要生态学的知识，例如克里人的行为是否“环保”（具适应性）少不了对鱼群的结构、动态和互动进行分析，某一种自然资源的稳定性建立在产量、生长率和生物量的平衡之上。

---

5 《当代人类学十论》。潘天舒著。上海三联出版社。2012年7月。

6 Barth, Frederik.1961. Nomads of South Persia. Boston: Little, Brown; Johannes, R.E. 1981. Words of the Lagoon: Fishing and Marine Lore in the Palau District of Micro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7 W Cronon .1983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New York: Hill and Wang

8 Milton Kay.2013.Environmentalism and cultural theory: Exploring the role of anthropology in environmental discourse.Routledge.

9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a historical reader. (ed)Michael R.Dove and Carol Carpenter. Blackwell  
10 F Berkes .1987.Common-property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Cree Indian fisheries in subarctic Canada



其次，在看待环保问题时需要去除种族中心主义观念。现代西方资源管理的一个理论基础是：“通过在当下有选择地利用（harvest）资源，人们能够对未来的资源可用性和丰度产生影响。”这与“公地悲剧”的理论基础是一致的，即通过技术和理性能够主宰与掌控生态危机。然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因纽特人和克里印第安人的观点中，灵性存在、兽类或鱼类才是行动主体，人类是被动的。民族生态学是认知人类学的一个亚领域，它以结构语言学为手段去了解当地人对周围环境的感知，从而得到当地人所具有的世界观，向我们展示了本地知识和实践对于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借鉴作用。并得出如下结论：环境是文化建构的产物。按照这个逻辑，民族生态学否定所谓的西方科学观和非西方世界观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别，因为“一旦知识本身被看成是社会建构的，那么西方科学所理解的生态学与其他任何环境观点一样，都不过是‘民族生态学’<sup>11</sup>。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会在圣地禁猎，为了确保他们有不间断的猎物来源而举行仪式，如同绿色环保组织成员履行环保职责一样。然而对动植物的敬畏并不意味着必然有随之而来的环保行为，原住民可能将这种所有权全部用于社会功能的实现（体现自己的慷慨大方），例如夸富宴这样一种礼尚往来的形式。后现代时期的多种生态学认为，人们与自然的关系，与社会组织及精神信仰密不可分的关系<sup>12</sup>。例如，Biersac 在分析巴布亚新几内亚凯尔山地区（the Mount Kare）的挖金浪潮时，注意到当地派尔亚人（Paiela）在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后，将凯尔山的金矿解释为巨蛇图腾的身体，金矿的发掘意为巨蛇秘密的揭开，标志着太平盛世即将到来，使人们找到通往天国的路，如此为资本主义的迅速渗透到当地生态环境中发挥了巨大促进作用<sup>13</sup>。

在全球化语境中，围绕着土著和原住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主张保护文化生存权利的人权活动家和主张保护动物福利权的环保主义者之间，在生存还是环保之间，很难达成具体的共识。

### 人类学与“公地困境”的解决办法

对于这一悲剧，哈丁提出的解决途径是“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私人财产出售。

---

11 哈里斯，1989，《文化唯物主义》，中文版第一版，华夏出版社，第13页。

12 Environments And Environmentalisms I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Facing a New Millennium. Paul E. Little. Annu. Rev. Anthropol. 1999. 28:253-84

13 Aletta Biersack The Mount Kare Pyt hon and His Gold : Totemism and Ecology in the Papua New Guinea Highlands1 [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 19991101 ( 1) 1

我们也可以继续把它们作为公地管理，但对权利要恰当的分配。”而“对于不动产和其他物质财产，我们选择的是建立私人产权和法定的继承制度。”<sup>14</sup>

和哈丁预计的解决方案相反的是，强制的捕捞和采集限制，往往含有虚拟性(virtualism)的问题，因为对于保护区中土地的价值和重要性，当地居民和研究人员总是有很不同的想法，这是因为对于植物、动物和自然过程，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评价系统。<sup>15</sup>也因为这个原因，关闭公地和改革土地所有制的法律和政治手段往往落后于资源使用者对所有权的交易，这就需要人类学者作为“文化中介”将本地智慧加入政策制定中。而由上而下的私有化，往往在解决“公地悲剧”的同时，会造成“公民悲剧”，即一些平民个人、团体或家庭被排除在供特权阶层使用的珍惜资源之外，这与其理想中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相去甚远<sup>16</sup>。国家如果篡夺公地所有者群体对其使用权和制定规则的权利，如果在世界体系中对本国自然资源价格未加保护，或对政治控制的兴趣大于资源管理，将成为公地悲剧的祸源。

在土地的共有和专有制度之间的转换，是和亲属制度及政治制度，以及气候等自然条件密不可分的（后者甚至会造成同一片土地在公地和非公地之间的季节性转换）。世界上不同社区对公共资源利用的不同之处，源于社会组织的不同，也源于文化观念中对“自然”的定义不同<sup>17</sup>。交易费和资源、市场和法律环境的变化都有关系。经济学家通过占用和保卫不同种所有权需要的交易费来分析资源的所有权是如何转变的，这种微观经济学的所有权分析法与人类学者和生态学家的方法<sup>18</sup>有着相似之处。在朱利安·斯图尔德早期对大平原上的肖肖尼印第安人的所做的田野研究中，认为在自然资源的丰度、可靠性，与当地是否要求财产的独占权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而 Netting 对族群公地的分析，揭示了同样的生态经济学规律：容易划分的、高产的土地一般属于个人，而为公众需要，产量却较为分散、较低或无法预计的土地则划为公地。这是为了规避划分土地中的交易成本，并且在不可预计的自然灾害面前增加集体应对能力。另外在人口流失的情况下，公地则能够吸引更多的外

14 加勒特·哈丁：《公地的悲剧》，载[美]赫尔曼·E·戴利、肯尼斯·N·汤森编。《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M]，商务印书馆，2001。

15 Parks and Peoples: The Social Impact of Protected Areas. Paige West, et al. Annu. Rev. Anthropol. 2006. 35:251-77

16 Ciriacy-Wantrup, RC Bishop, 1975. Common property as a concept in natural resources policy.- Nat. Resources J.

17 PJ Vondal 1987. The common swamplands of southeastern Borneo: Multiple use, management and conflict.

18 DJ Rapport, JE Turner. 1977. -Economic models in ecology Science,

来者。所以公有财产被私有财产代替的趋势并非不可避免。

国家和公民对自然资源的共同管理是有可能的，在拥有“船只配额体系”的冰岛这从 1980 年代就已经成为了现实。在我们仔细考虑了“公地悲剧发生与不发生的条件”(Berkes)之后，便有理由质疑这一论断，即“追求利益的个体和一致性的、甚至分裂的社区不可能凝聚起解决公地困境的集体意志”。人类作为社会行动主体，出演的不应是一出悲剧，公地也不应该没有相应的使用者群体和使用规则。互相依存、交流和合作是解决“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的良方，但需要更具体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定位。

## 结论

从人类学对公地悲剧理论假设和解决方案的批评，可以看出本专业在现实世界应对环境问题的适用性。“社区环保”(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需要人类学者进入跨学科研究队伍中，发挥其整体论视角的整合功能，并对传统的参与式观察法进行创新以适用于需要在短时间内解决的实际问题。本文中涉及的宗教(精神性)和政治方面是逐渐在当代环境人类学占有重要地位的两个分支。在关注本地知识的同时，也关注国家层面的环境政策，使得人类学者无论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还是由社会精英阶层主导的“混合型”环保项目中都能够起到“文化中介”的作用。<sup>19</sup>

---

19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Today. H.Kopinina&E.Shoreman-Ouimet. Routledge.2011

## 环境人类学：农村发展理论与方法

环境问题无论从地方还是全球的规模看来都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一般的环境研究更多注重的是科学、政策和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本地的文化现象。然而如何制定环境政策，让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来？对于这个重要的方面，人类学有着独特的贡献。和利益相关者一同工作、为其代言并对其作出分析，正是人类学者所长，且跨学科方法使得人类学者可以结合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研究。

戴维森文理学院人类学系教授，复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特聘教授罗立波博士于6月13日下午为我们带来题为“环境人类学：农村发展理论与方法”的讲座，以自己在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完成的论文“学习养鱼：在北卡罗来纳州发展可持续水产业”为例，详细说明了人类学者是如何参与环境研究的。

在1970年-2008年期间，鱼类养殖是所有农业部门中增长最快的一个，其增长率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率(FAO 2008: 6)。2008年，人类所有的鱼类消费中，接近一半来自水产养殖业（在中国这个比例是62.3%）。大部分的水产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是最大的生产国，这些富有价值的出口物种使得水产业成为了一种发展工具。虽然水产养殖并非新生事物，但1970年以来的爆炸式增长使其成为了一个革命性的生产方式，随着动物蛋白消费的增加，它被描绘成拯救环境、改善经济 (Sachs 2007)、保障食品安全(Godfray et.al. 2010)的万灵药。

食品是检验环境（保护）、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三重底线<sup>1</sup>的一个十分具有启迪性的透镜，也是可持续发展<sup>2</sup>的一个指标。与其他动物蛋白来源比起来，鱼类一般来说比牛肉、猪肉或鸡肉有着更高的饲料转化率 (Steinfeld et.al. 2006; Hall et.al. 2011).而无论在土地使用还是退化，污染排放，还是淡水与能源消耗上来说，水产业相对于畜牧业都有着较小的环境成本 (Hall et.al. 2011)。然而这种增长也常常被批评

---

<sup>1</sup> 在商业中三重底线被称为“人，地球，利益”，(P<sup>3</sup>: people, planet, profit); ; E<sup>3</sup> 最早的模型是在欧盟对京都议定书的准备会上提出的，为能源-环境-经济，后来被研究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文献改为“生态-经济-公正” (ecology, economy, equity) (见 Schumpeter 2011, Young and Tilley 2006).

<sup>2</sup> “可持续发展”：或永续发展，是指在保护环境的条件下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的需求的发展模式。1987布伦特兰委员会（又称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会提出这一名词，指出发展的三大分支是环境、经济和社会。

为是不可持续的，可以说水产业有着以下环境问题：1.直接带来环境退化：由于密闭式动物喂养系统(CAFO)带来的疾病和粪便。在农业理论中，只有“将稀释作为污染的解决办法” (“dilution as solution to pollution”)。2.由于较为美味的食肉鱼类需要大量饲料和鱼油，即食物链下端的水产品来喂养，于是加快了捕捞业“沿着食物链向下赶尽杀绝”的趋势。3.在用以留种的野生鱼种的捕捞上，浪费率非常高，也起到了与捕捞业相似的灭种效应。4.能量和水的消耗很大。5.引入非本地入侵种造成生物多样性的丧失。6.陆地、沿海和海洋的大片栖息地被用作渔场。水产业生产系统的生态多样性带来了这样一个悖论：“对于全球性的渔业库存的崩溃，水产业既是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也是一个可能的导火索。” (Naylor, Goldburg, et.al. 2000:1017) 混养（包括传统的一体化农业）和循环系统养殖，是两种生态可持续水产业的方式。

同时水产养殖还具有以下社会不可持续问题：生产方式与生态系统的紧密结合，以及对共用资源的依赖<sup>3</sup>。管理问题。政府和市场治理问题（需要通过合适的政府管理和关于外部性的经济核算鼓励水产养殖企业“将稀释作为解决办法”）。在农民互相之间、与政府之间、与消费者之间的（科技与经济）信息流的不畅，缺乏“信息化的环境治理”<sup>4</sup>。

北卡罗来纳州在1989年通过了农业发展法案，州农业部是主管机构，并在2011年前设有海产与水产养殖联合立法委员会，北卡罗来纳水产协会(NCAA)为主管机构的协同机构。在政府治理方面，美国的规章制度架构直到21世纪还存在如下对水产业发展的阻碍因素：海洋(包括远海和近海)辖区重叠、多用争议。另外，对于水产业的调控和管理来说，似乎没有一个专门负责的功能实体，分散的调控权力体制使得水产业管理，尤其是海产养殖管理上出现了很大的漏洞。通过法庭系统代替管理机构的指导方针，始终不是一个建立可持续性水产业的有效方式。在北卡罗来纳州，由于养殖规模较小，且没有远海的海产养殖，在联邦法律中出现的断裂现象在州一级上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在北卡罗来纳州与其他州的政治生态学<sup>5</sup>也有了明显的不同。这个州的水产业集

---

<sup>3</sup> “公地悲剧”有关文献，讨论管理环境的社会结构。参见 Hardin 在1968的经典论文， Eleanor Ostrom, James Acheson 和其他人的许多文献。

<sup>4</sup> 需要做更多研究来理解信息化的环境治理在可持续发展实践中如何应用，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长距离的供应链和食品购买对于大零售商的依赖，使得生态标签未必意味着可持续性，FAO (2010c:85)提出的“参与式治理”未必适用于一般消费者。(Washington and Ababouch 2011)

<sup>5</sup> 政治生态学：强调人类对环境的利用中的权力关系；和政治经济学类似，但是将重点置于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上；另外，与环境科学的关联较小。

中在东部，基本是淡水池塘养殖，使用室外温水池塘，一些贝壳为循环养殖，非本地种（如罗非鱼、对虾）的养殖有着增加趋势（但需要特殊许可，原因见上）。这些基本情况对于发展是否可持续是非常重要的。北卡州渔业的可持续性，在于由于养殖规模小，其不依赖于共用资源；通过合作社进行有效的生产系统管理；有效的政府和市场管理；对环境的法律监管较为连续，且瞄准了特定市场；有效的信息化治理（包括生态标签，第三方认证等）；在州政府机构和个体农户之间有着较强的社会网络，信息流较为通畅。罗立波博士对北卡州各处从事水产养殖农民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尤其是对两次北卡农业发展会议进行了田野研究。并在传统人类学质性研究方法中加入了社会网络分析(SNA)、定量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sup>6</sup>和地理信息系统(GIS,e.g. esri)等定量方法。研究希望阐明，社会语境和相应的社会关系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北卡州东部克雷文县的混血柳鲈养殖场主蒂姆·丹尼斯夫妇，和周边种植庄稼、养鸡和其他农产品的邻居一样，称自己为农民，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关切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蒂姆十分强调农民和渔民的区别：“饲养”的概念——“把鱼当做婴儿来养，它们也就会通过市场来反哺”。渔业和养殖业不仅在法律上有着各州和联邦认知不一的冲突，且在两个群体之间也有着社会冲突，主要由于渔民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和野生种数量水平下降，他们在经济上的地位正在渐渐被养鱼的农民代替 (Andreatta and Parlier 2010; Tango-Lowy and Robertson 2002; Ziegenhorn 2000)。这也是为何海洋空间规划在水产业发展计划中特别被提出的原因(FAO 2010b)。詹姆斯·艾奇逊认为，在世界各地的渔民中存在一种共享的文化，他们对渔业的独立和自由特点有着近乎信仰的忠诚。愿意转入养殖业的渔民都是对这种文化不那么认同的。

养殖场从1991年开始经营，蒂姆照顾养殖场，他曾经是一名制造业的水质工程师，认为最重要的技巧是保持饲料用量和水质之间的平衡。他的妻子贝蒂另有一个全职的工作，北卡州的推广官员介绍说他开的是“夫妻老婆店”。这对夫妻也是2002年北卡州第一家养鱼农民合作社<sup>7</sup>的创建者之一。

<sup>6</sup> 定量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是一种“数字人文”的工具，例如 MAXQDA, the Google Ngram Viewer, NVIVO

<sup>7</sup> 奥巴赫(1980:48)认为，合作者有四大功能：增加了利润、降低了成本、拓宽了产品和服务，并为成员的社会或政治目标服务。他进一步将合作社描写成民主管理的、资金成本与利润在成员间共享的、且注册了的法律实体 (1980:49)。

就如蒂姆丹尼斯夫妇一样，北卡州北部的一名罗氏沼虾养殖场主丹·史密斯夫妇曾经也在本地区的企业有着全职工作。由于联邦政府对种植烟草农民转型的支持，2005年史密斯夫妇决定用继承的家庭农场土地（本来租给烟草农）来养虾，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市场推广”，农业合作社正满足了这个需求。史密斯是“美国对虾合作社 APC”的创建人（2008）之一，合作社的口号是“美味来自新鲜”，它为生产对虾的成员提供市场服务，也提供加工设备，使得其产品能够符合纽约与加州亚裔消费者群体的需求。现任主席珍妮薇说道：“农民一般都是不愿合作的，但是在这个团队里我们都知道合作才能够是我们的利益最大化，因为我们是在打造行业”。由于对虾在美国的市场新近才出现，且农民、渔民对“合作社”的理解已经与80年代不同，能够接受这种“共产主义”的事物。

在建立合作社的过程中，北卡罗来纳州的政府推广机构参与程度非常高。蒂姆·丹尼斯就提到“来自州政府推广机构的建议十分重要”。在合作社人们分享市场信息和生产有关专业知识，例如 APC 就制造了一套加工设备。合作社取得了来自第三方——蒙特里海湾水族馆 MBA 的海鲜观察项目的“最佳选择”营养标签。并获得了烟草信托基金和国际农村进步基金会，以及北卡州农村经济发展中心的资助。参与合作社当然意味着资源的共用，然而社内成员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个人的，因为水产业需要控制环境，这一点与渔业的公地概念不同。



图一：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内的鱼谷仓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NCSU)Thomas Losordo 博士的专利鱼谷仓（Fish Barn，见图一），是一种循环系统(RAS)，“以养鸡的方式养鱼”。如此，便能够减少废水污染，提高生产效率，食品安全更有保障。实验自1989年开始运营以来，便以“评估和发展

集约型水产业的循环技术，传播最经济和可持续的水产设备运作方式”为己任。

城市水产业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利。2011年，得益于州立大学的 Fish barn 技术，里克·伊斯顿在北卡最大城市夏洛特建立养殖场，面临着城市区划、水源和公众不认可的困难，他认为：“如果没有政府推广机构的支持（例如，向夏洛特城市规划者说明鱼谷仓不是谷仓）和理想的场地（坐落在机场旁的一个仓库），是无法完成的。”另外，是“本地的、可持续的鱼类”，这种有市场号召力的混合信念即文化力量，或许再加上“最佳选择”即食品安全的标签，帮助他也帮助消费者克服了对养殖鱼类的偏见。许多最近兴起的社会运动，与“本地的复兴”有关。在全球化时代中，合作社的再兴起是地方性抵抗（不道德而危险的跨国公司）的象征——一座道德堡垒。也是小企业打造商标的机制；反过来说也是一种结构性力量，为当地人提供另一种获取资本密集型设备、扩大消费群体的渠道。城市农业<sup>8</sup>在美国的很多城市社区已经成为了流行，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农业改善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降低食品运输成本，促进经济。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移民社区，也同样适用。城市农业可以是业余爱好，也可以通过像里克这样的商业运作成为一种现代生态工程(Costa-Pierce et.al. 2005, Lutz 2005)。

北卡罗来纳州水产业发展大会每年举行一次，北卡罗来纳水产协会(NCAA)同时召开会议，目标是信息共享，具体为“汇集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广大市民，当前和未来的养殖户，科学家，以及来自监管机构的人员交流北卡州水产养殖业信息与思想的发展”。大会集中反映了通过田野调查可以发现的问题，那就是小规模的水产养殖使得对社会网络的依赖性很强，通过建立合作社的方式，网络得以强化，且州政府机构和大学研究人员对于网络的维持起着关键作用，信息化的环境治理对于生产者来说也帮助很大。具体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合理的管理和对农民的教育，以及促进可持续农业的经济刺激——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均有的经济人理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流，是促进而非阻碍可持续性实践的因素。其中，信息化的环境治理，即公民社会组织在政府的参与下建立和推广可持续性评级标准，是商业企业最大的约束力来源。是无论市场手段还是政府调控都无法替代的作用。在水产业中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了所有以下行动者：政策制定者，监管部门，私营部门，社区，发展项目的捐赠者，以及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流应当通过正式的生产者协会和其

<sup>8</sup> 指的是“在城市内或城市的边缘种植、加工和分配粮食与经济植物、果树，还有饲养牲畜，直接供应给城市的市场”(Mougeot 2006: 4)。



他组织的社会网络进行扩展。

最后罗立波博士表示，希望在中国找到合适的用作比较研究的田野点，比对中国有无这种以农民为核心的信息流和合作社的对应形式。在环境人类学田野研究中具体的理论问题还涉及“大自然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nature)：强调自然的文化意义，即人们看待、理解和生产自然的方式。以及“城市生态学”(urban ecology)：从生态系统的视角重新审查城市空间（土地和资源分配），社会分层，城市政策等。

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冯然（整理）

## ※活动掠影※

## 失范社会是否已经来临:道德底线的突破及其伦理意涵

复旦当代人类学讲坛（十三）  
特邀嘉宾阎云翔教授演说述评



这是最好的岁月，这是最坏的岁月；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暖春，这是凄绝的严冬。狄更斯名著《双城记》中的这些字句，是对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冲击下的社会众生和道德世界的精彩概括，也为此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运用“失范”（*anomie*）概念来探讨从自杀到个人主义以及信仰实践等一系列议题，提供了极佳的研究场景和语境。

前辈大师们的洞见，是否有助于我们深度理解和细致分析处在全球化和地方转型两股结构性力量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更确切地说，我们能否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来设问：如此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社会是否已经失范？2012年10月9日下午，来自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的阎云翔教授在复旦光华楼就此问题展开了一场精彩的讨论。该讲座引起了复旦师生的广泛关注，可以容纳400多人的报告厅座无虚席。

在讲座开始，阎云翔教授首先探讨了“失范社会”（*anomic society*）的含义。一种观点认为，失范指的是社会规则和规范的丧失，一种社会陷入混乱的条件。另一种观点则将“失范”定义为价值观的错位。例如涂尔干认为：现代化带来的多元化趋

势使得个体或群体的价值观与社会主导的核心价值观难以吻合对应。哈耶克则认为，是实现目标的途径与目标本身产生错位。具有田野体验的研究者对“失范”一般都有这样的共识：人们普遍感到紧张焦虑，丧失生活的动力和方向。一方面在陈规旧习已经被证明行不通时，而另一方面却又找不到可以替代的新的道德准则，来约束和控制个体的欲望和行为。

围绕着“失范”（anomie）这一关键词，阎云翔教授主要就以下三个问题展开全面论述。

### **道德/信任危机是民间和媒体的错误判断还是真实存在？**

阎云翔指出，近年来，有关道德危机和信任危机等类似的话语经常出现在民间社会和媒体报道之中，学术界则很少有扎实的经验研究来正视和考察这一问题。那么，道德危机或信任危机是一种错误的判断还是真实的存在？阎云翔以“做好事被讹”和“食品安全问题”以及他历年来田野研究发现为例，证明不道德行为（immorality）的确是一种涂尔干所说的可以观察和分析的“社会事实。”他认为，当代社会的不道德行为已经由私人领域拓展到公共生活领域，不仅伤害了某些个体的利益，而且危及到整个群体的利益，已经触及了更加基础的社会原则和道德底线。

震惊全国的“小悦悦事件”促人反思：为什么经过的行人都如此冷漠，不上前帮助？阎云翔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害怕做了好事反而被讹。在“做好事被讹诈”的表象背后是对人性本善的怀疑，不相信陌生人会没有任何理由地主动帮助自己。“如果不是 xx 撞了我，他又怎么会无缘无故的送我去医院？”其他原因还有司法系统在执法上的缺陷（是有罪判断而非无罪判断，默认了没有人会无私地帮助陌生人的偏见，对讹人者的不惩罚）、围观者的沉默以及社会贫富差距悬殊，使弱势群体产生了“仇富”的心理：“反正 xx 有钱，讹一下也没关系。”

针对食品安全问题，阎云翔首先指出，目前中国大陆的食品安全问题是被媒体不恰当地夸大，很多食品的毒性（如地沟油）有待于进一步科学证明。食品制作过程中的卫生问题危害要大得多。事实上，食品安全的风险是由 3 个层次的风险叠加在一起，是一种混合性风险，需要全社会通力协作，共同关照，来应对不道德行为对社会公信力的巨大冲击。

### **实践者（受害者和加害者）的感受和体验**

受害者直接的身体体验表现为：恐惧—缺乏安全感---不信任。而加害人又是如

何解释自己的缺德行为？“我又不认识他，反正是生人，无所谓。”“他们都有医疗保险。”“从前被城里人欺负得厉害，这样做有种快感。”“我认为是道德就是让家乡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就“做好事被讹”一事来说，加害者在家庭和村庄的范围以内往往是善良的，勤劳的，负责任的，是个绝对的好人。但对陌生的受害者来说则是绝对的缺德行为。这反映了加害者的良心具有两面性。而加害者的良心总是面向“自己人”的那一面。对待“自己人”和“陌生人”的道德标准不同，缺乏超脱于私人关系之外的公共的道德观念。在此，我们不妨回顾阎云翔的学术导师、哈佛医学人类学教授凯博文（Kleinman）对“道德”和“伦理”所做的区分：在人类学意义上的“道德”是受制于地方观念和权力的一种主位认知和体验，而基于客位的“伦理”则代表着一种摆脱地方约束并且力图实现道德生活目标的理想和努力。日常生活实践中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困境。

阎云翔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流动性不断增强，由熟人社会逐渐向陌生人社会转型，需要建立起社会信任。社会信任主要包括对制度的信任，对专家的信任和对陌生人的信任。而对陌生人的不信任会造成社会公信力的下降，难以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信任，社会转型就会举步维艰。

### 变迁社会中道德标准的变化

阎云翔指出，改革开放的中国，道德范畴和价值观经历了一个私人化个体化的过程，由集体主义的“自我牺牲”向个体主义的“自我发展”转型。转型的结果是道德判断标准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出现了多重道德标准。价值观的变化导致了有很多有争议的道德行为。例如过去所认为的不道德行为现在可以被接受，如婚前性行为。

另一方面，道德标准的变化也带来了问题。官方道德话语标准与日常生活实践中真正相信并身体力行的道德标准是有差别的，两者出现错位。如个体在汶川地震的自愿捐款被官方塑造为集体主义精神并加以宣传。这种集体主义伦理话语不允许有个体任何私心杂念，被迫放弃自我。可见，这种个体化的转型是由国家主导，个人的主体性发展不明显。

虽然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可以多样化，但是否存在一个绝对的道德权威或者说是道德底线，几乎达到信仰程度，是不能被越过的？阎云翔认为，道德底线是无法被证实的，但一旦被冲破，其后果是可见的，而且是很严重的。将对社会公信力产生巨大的冲击。有争议的道德行为并不一定是不道德的，但有两个前提：首先，要相

信陌生人不会无故加害于你，其次，无论做什么都不能伤害他人的利益。

### 失范社会是否已经来临？

最后，阎云翔回归讲座的主题，试图对中国社会是否已经失范的问题做出解答。由于学科背景和方法论取向的不同对“失范”的不同解读，必定会得出不同的答案。如果失范指的是混乱无序，毫无规则和道德规范可言，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失范指的是由不同价值观的错位所造成的复杂现象，那么中国社会确实是失范的。在这个道德标准多元化的社会，个体会无奈，会困惑，会迷茫，他们在其中挣扎，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道德观念，来安放自己的良心。阎云翔同时安慰在场的所有听众：不道德行为（immorality）带来的并非全是负面影响，就像小悦悦事件引发了国人对自我灵魂的拷问，这令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道德转型成功的希望。

在阎教授精彩的演讲之后，美国大卫森学院的罗立波教授进行了简短的评议：道德/信任危机不仅存在于中国，也见于美国等很多国家。所不同的是：在当代欧美学者中所存在的一种“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相对主义心态，无法正视普通民众中所存在的道德失范行为，而不幸落入人类学认识论自设的陷阱，难以做出能够达到涂尔干和默顿水准的开创性研究。随后复旦师生与阎教授进行了问答互动，并结合中国和世界的现状进行了思考，呈现出跨学科交流的可喜景象。

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 2012 级硕士研究生 张小星（整理）

## 有机食品田野掠影

董丽霞

对于有机食品的研究持续了两年，期间找了各种资料，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对不同的人群进行了访谈，但是一直没有好好地整理一下自己的研究过程，借此机会以图片的方式回顾一下自己的田野踪迹。

研究始于2010年暑假对寿光模式的研究（具体见《村庄里的大棚：寿光模式的人类学思考》），当时食品安全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在田野期间，潘天舒老师在邮件中提示我可以问问当地农民对有机食品的看法。然而我刚开始田野的时候，当地农民对“有机”一词还比较陌生，只有极少数的人听说过这个词，而且几乎没有人清楚地知道有机食品的定义。

田野回到学校后，我开始不断的关注有关有机食品的资料，偶然的会在复旦BBS上看到根与芽（Roots and Shoots）在招“有机农场绿色导师”。虽然不清楚这个岗位具体干什么，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学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就去参加了面试，由于自己确实有种植农作物的经验而顺利通过。接下来便开始大量参加志愿活动，也正是在这些活动中学到了有机食品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知识。



图1：2010年“根与芽”，根与芽小组的学生请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喝冬瓜汁（冬瓜是学生们自己种的）

2010年的“根与芽”活动让我从行为上知道了什么是有机食品。自己亲自种农作物，种植过程中利用生物链避免使用农药、化肥，有机食品就是不用农药不用化

肥，以前不明白为什么家乡井边随处可见的一盆薄荷要 50 元，答曰：有机。

通过参加于 2011 年 5 月举办的国际（上海）有机食品博览会，我更加清楚地



图 2：百欧欢有机农场的“生物防虫法”介绍

知道了有机食品的国际认证标准，有机不是随便说的，需要“认证”；同时知道了不仅食品可称“有机”，还有有机服装、有机日化用品、有机家具等等，总之，这里的任何东西都有“有机”的标签。



图 3：百欧欢有机农场的工作人员在给上外附中的根与芽小组讲解迷迭香的驱虫功能





图 4：国际（上海）有机食品博览会上的有机卫生棉广告

2011 年 6 月前往多利农庄参观，感觉“有机”是奢侈的，是需要大量的资本的。



图 5：多利农庄讲解员向参加多利农庄酒会的会员讲解有机蔬菜的种植

2011 年 10 月我前往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 CSA（社区支持农业）大会，方意识到“有机”是和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



图 6：北京小毛驴农场的农夫



图 7：上海农好农夫市集上。市民自带矿泉水瓶来打农夫自己酿的米酒

2011年12月-2012年5月在上海农好农夫市集做志愿者的经历使我意识到“有机”也可以不需要有机认证，可以不奢侈，但是需要“信任”，而“信任”是很难建立的。这个市集推广不使用化学农药的生态农业，让城里人和农夫直接接触、了解和交易，推广健康餐饮的新观念，展示农业和乡村的文化魅力，展示城市知青返乡务农的成果。



图 6：上海农好农夫市集正在交易的农夫和市民

## 复旦大学第二届人类学日

时间：2012年11月3日

简介：本届人类学日邀请了来自社会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等领域的国内外学者。在以社会文化人类学为主题的学术报告中，Ted MacDonald、吴松第、纳日碧力戈、沈奕斐和朱剑峰5位演讲人分别从应用人类学、历史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影视人类学的视角切入，就人类学的前沿理论和田野实践展开讨论，探索了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传播了专业人类学知识，扩大了人类学的影响力。

活动掠影：



图为纳日碧力戈教授“语言人类学：从索绪尔二元到皮尔士三元”讲座现场



图为吴松第教授“国家科举与地方家族文化：对泰顺县旧家谱的分析”讲座现场

附会议日程：

### 2012年上海人类学学会学术年会暨第二届复旦大学人类学日

会议时间：2012年11月3日（星期六）

会议地点：复旦大学逸夫楼一楼报告厅

主办单位：上海人类学学会、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联系人：谭婧泽（65643714） E-mail：tanjingze@gmail.com

会议议程：

8:30-9:00 签到

9:00-9:20 金力会长致辞

9:20-9:25 颁发“人类学终身成就奖”（市社联领导为张海国教授颁奖）

9:25-10:25 我的人类学生涯回顾

演讲人：张海国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主持人：金力教授

10:25-10:40 茶歇、合影

10:40-11:20 Practicing Social Anthropology: A Cultural Survival Perspective

（社会人类学的实践：哈佛“文化生存”的视角）

演讲人：Ted MacDonald 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社会研究系）

主持人：潘天舒教授

11:20-12:00 台湾汉人与平埔族群的遗传组成分析

演讲人：陈叔俤副教授（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人类学组）

主持人：金力教授

12:00-13:30 午餐

13:30-14:10 国家科举与地方家族文化：对泰顺县旧家谱的分析

演讲人：吴松第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主持人：潘天舒教授

14:10-14:50 语言人类学：从索绪尔二元到皮尔士三元

演讲人：纳日碧力戈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主持人：张海国教授

14:50-15:30 中国的人类学和复旦的人类学

演讲人：谭婧泽讲师（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主持人：张海国教授

15:30-15:40 茶歇

15:40-16:20 网络时代的影视人类学

演讲人：沈奕斐副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主持人：张乐天教授

16:20-17:00 历史影像的人类学解读

演讲人：朱剑峰讲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

主持人：张乐天教授

## "文化基因"、叙事模板和国家记忆

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华盛顿大学(St. Louis) 副校长 James Wertsch 教授于 2013 年 3 月 20 日(周三)上午 10:00—11:30 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108 室为我们带来题为"Cultural DNA," Narrative Templates, and National Memory ("文化基因"、叙事模板和国家记忆)的讲座,主持人为潘天舒教授。

讲座的开始,潘天舒教授简要介绍了 James Wertsch 教授:James 教授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国际和地区研究及社会文化人类学两个专业的教授,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莫斯科度过了一年的博士后时光,感兴趣的领域是语言、思维与文化,研究集中在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集体记忆和认同,并将格鲁吉亚作为研究民主和公民社会如何产生的自然实验室。

James 教授用一段在莫斯科做博后时有趣的亲身经历将我们引入正题,同时这个恰当的例子也成为贯穿讲座的脉络。1976 年,在 Jim(教授本人)和他亲美的俄罗斯朋友 Vitya 关于广岛原子弹的谈话中,出现了一种叫做“记忆对峙”的现象。关于美国在 1945 年选择使用原子弹的原因,Vitya 认为是为了威胁苏联,迫使其从欧洲大陆撤军,Jim 认为是为了迫使日本投降、拯救生命。他们都不相信彼此说的是真心话,这就使得对话有了对抗性。

当我们谈论历史的时候,往往认为自己在谈论“事实”。可以区分这样两种“事实”:一是“命题事实”,二是“叙述事实”。评定命题事实可利用档案、证词,等等证据,并通过一定的客观程序进行。评定叙述事实,即动机、情节,例如“美国在 1945 年是否为了威胁苏联而投下原子弹”,就没有客观的评定程序,即便我们有着反面的证据也很有可能忽视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认为,我们的大脑有快与慢两种作决定的方式,常用的无意识的“第一系统”依赖情感、记忆和经验迅速作出判断,它见闻广博,使我们能够迅速对眼前的情况作出反应。但由于“第一系统”的自发性和无意识,固守“眼见即为事实”的原则,它也很容易让人上当,甚至不为证据所影响。在 Jim 和 Vitya 遇到的“记忆对峙”中,我们可以看到后一种事实即叙述事实的评定方式具有“第一系统”的特点。由于这种思维特点,在特定事件的话语中存在的“叙事模板”具有了透明特性,犹如一层透镜。Jim 和 Vitya 都觉得“这不是我自己的观点,而是事实”,相反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他们的思维下有着“叙事模板”这样深层的密码。

用“文化基因”来形容这种深层的结构力量和文化密码（叙事模板是构成文化基因的材料）。这一隐喻包含的假设有三个：

1. 文化基因是我们理解表面现象的钥匙，需要被发掘。
2. 和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深层结构”不同，文化基因是属于特定群体的，而不是全人类的。
3. 文化基因具有很强的保守性，改变非常慢。

国家叙事由国家生产出来，为民众提供了关于历史和族群认知的核心观点，不用正式教育就可被掌握，由人们内化。所以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工具”、人们话语的“合著者”，具体的例子就是 Jim 和 Vitya 的对话。“记忆对峙”这一现象引出了下一个概念：“记忆共同体”，指的是以基本相同的方式回忆过去的人群。在人群内部，当谈到“我们的过去”时，对话往往很容易进行，现代国家的精英阶层将其作为建构民族性的工具。

作为苏联问题研究专家，James 教授提出了俄罗斯民族“驱逐外敌”的叙事模板来分析俄罗斯民众对二战和 2008 年的格鲁吉亚战争的态度，同时指出，在别的地区也存在这样现象，例如对于我们熟悉的越战和抗美援朝，战争双方对战争的不同命名便体现了不同的叙事模板，我们可以思考自己国家的叙事模板是什么。

讲座的最后，James 教授提醒我们对我们的注意叙事模板的危险性要有所警觉。在这种叙述中包含了一种认知上的种族中心主义，阻碍人们认识到其他共同体叙述的合理性。而不同的记忆共同体则会“看到”不同的“叙述事实”。这种认知差异是顽固持久的。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发展为所谓的“封闭叙事”，即在叙事中缺少一些具体信息从而无法被验证。英国驻高加索地区的记者 Thomas de Waal 在在见证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流血冲突后创造了这一词汇，认为这种“封闭叙事”是冲突的由来，而冲突最终成为导致叙事模板发生变化的动力。在叙事模板内部存在有张力的两极：一端是图式(scheme)的普遍化使得它拥有了难以被证伪的特性，另一端是模板的种族特殊性。这一对看似矛盾的特性意味着叙事模板可以成为非常灵活然而强有力的文化工具，是自恋和种族中心主义思想和话语的合著者。对于这种“给予我的工具”，只有进行独立研究才能对其进行批判。

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冯然（整理）

复旦人类学新浪博客：

[blog.sina.com.cn/fudananthro](http://blog.sina.com.cn/fudananthro)



复旦人类学新浪微博：

[weibo.com/fudananthro](http://weibo.com/fudananthro)





为了维护保护区内生态和谐，崇明的农民与保护区达成限时限量牧牛的协定，图为当地农民的牛在保护区内吃草。 摄影：冯然



上海崇明东滩保护区涨潮时的景象及收割芦苇的人住的草棚 摄影：冯然



